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05年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

——田纪云 杜润生 任仲夷 于光远 李锐 阎明复等

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

文革前上海党政关系的争论

《清明上河图》之谜

纪念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胡耀邦九十诞辰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胡耀邦



- 1 1933年9月，十八岁的胡耀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少共中央局担任秘书长。
- 2 胡耀邦和李昭1941年结婚。他们相互敬重，相伴终生。
- 3 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时，在太原前线作战会议上聆听彭德怀司令员讲话。前排右一为胡耀邦（1949年）。
- 4 1957年5月，团的三大闭幕后，胡耀邦陪同毛泽东接见全体代表。
- 5 邓小平从五十年代起就是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人。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后，对胡耀邦的许多工作都给予支持。
- 6 德高望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胡耀邦敬重的老

- 一辈革命家。他经常向叶剑英请教和汇报工作。
- 7 1985年6月中旬，胡耀邦在山西吉县农家坑头，和农民郭栓旺等商讨如何开发山区，治贫致富，过上好日子。
- 8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胡耀邦接见青联委员、台胞李大维（1983年）。
- 9 1957年，胡耀邦主持仪式欢迎苏联共青团代表团。
- 10 胡耀邦在四川松潘黄龙山。
- 11 1989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 12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夫人李昭感谢共青城的乡亲们。

炎黄春秋

目 录

专 稿

- 2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郝怀明
- 13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 田纪云、杜润生、
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
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

春 秋 笔

- 23 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 丁龙嘉
- 27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李一鑫
- 31 重读顾准——纪念顾准九十诞辰…… 高建国

亲 历 记

- 37 文革前上海党政关系的争论…… 范征夫
- 42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刘仰东

沉 思 录

- 46 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 史义军
- 47 节约型社会首要是在节官…… 章立凡

怀 人 篇

- 49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张颖
- 56 塞克的人品与文品…… 孙焕英

往 事 录

- 58 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于继增
- 63 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 阎稚新

人 物 志

- 65 刘奠基：晋察冀边区的国民党代表…… 刘书城
- 68 带头实行新老交替的谭启龙…… 杨汝岱

古 今 谈

- 70 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任继愈
- 72 “裱糊匠”李鸿章…… 向继东

文 荟 苑

- 75 《清明上河图》之谜…… 张梦君
- 79 矢野浩二：我想演一个中国人…… 章弘

顾 问：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庄其环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4.80元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 郝怀明

1986年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了。作为文件起草的参加者之一,我愿意把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供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研究参考,同时也是以志缅怀。

“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真正成为“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方针?能不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指导?这已成为在前进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议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定;(二)通过召开十三大的决定。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这个文件的起草。

12月25日,胡耀邦在办公室召集起草组同志开会。起草组共有5人,即郑必坚(胡耀邦秘书)、林润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和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局级调研员),还有丛兵(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干部)。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经济学可以继承、借鉴的东西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可借鉴的东西少一些。大主意还是道德风尚。“四有”是对全民族的要求。你们在小平、我、紫阳讲的框框里面搞不行,要重新提炼一下,不然没有什么新话嘛。

战略地位怎么写?几十年,从生产力、人与人关系上变成个什么样子,从这里面讲。也可以做个回顾:过去不能办,不可能办,没有办,现在为什么能两个文明建设同时担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物质不极大丰富,是不成熟、不稳固的,这就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什么叫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都要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教育问题写一段,15年的要求,各类学校奋斗目标,知识程度,文明素养,甚至体质的要求。要写出新的道理。

在谈到思想、精神、道义上的一致的问题时,胡耀邦说,首先写奋斗目标,写三大步,写“四个坚持”,写如何达到一致的办法。不要“四大”的办法,采取什么办法?要总结大的历史教训,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如何,讲点道理。怎么一致,写这几年成功的经验。最后写党,主要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胡耀邦这次谈话,为文件起草提供了重要指针。

“这个文件难度很大”

1986年2月29日,草稿写出。3月4日、8日,胡耀邦两次主持有几位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中央有关思想理论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

胡耀邦说,这个文件难度很大,草稿离全会通过的要求还差得远,道德比较好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为人与人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打开了前景。对怎么团结互助,家庭怎么搞,作些规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很实的呀。没有哪国不称赞我们这个的,要加以总结提高。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

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

会上,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几位同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列出了一些题目。胡耀邦最后归纳为12条。

3月9日,是个星期天。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头一天会上讲的12条。他希望能够搞成一个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武装了全党,精神文明决定应该是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有科学的概念,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二条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和实质。

第三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写三代人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理想,全国人民政治团结、道义、精神一致的根本基础,80年代就干这个事。自我完善的话要有。共产主义也挂上一笔。前面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两三句话写

清楚这个历史观。写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写出困难,写出长期性。

第四条,对外开放,就强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本领。长期搞开放政策,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吸收人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东西。科技文明不在第三世界,在发达世界,没有几十年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不向人家请教,拿过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上不去。怎么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先学习再创新,几十年嘛,坚定不移。世界上把中国对外开放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最有希望的一部分。中国对人类创造的两个文明抱什么态度,若干年后,中国又反转来影响世界的进步与文明,对这个关系要讲。

第五条,新人的培养。不只是青年,包括老年,都要转到新社会、新体制下来。新人就是这个意思。“四有”分别概括一下所谓纪律,就是整个民族的统一的意志。整个民族兴旺发达,服从这



胡耀邦

个就叫有道德,这是我们道德的核心。

第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人吃人的尔虞我诈的不人道的关系,建立了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规划几个基本要求,如何对待老幼、鳏寡孤独、妇女、残疾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多少年达到什么。国家、社会、机关团体、家庭的职责。为不断完善美好的人和人的关系出力尽职。搞好了,社会就安定、和睦、友爱。

他建议开些调查会,了解点实际情况。文件使人看了:1、我明白了,重要性在哪里,是些什么内容;2、我有一定抓手了,知道怎么抓了;3、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大的偏差了。他要求4月中拿出稿子,在百人中讨论。

多方访谈研究实情

起草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同民政部、全国妇联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登门造访了邓朴方、费孝通、赵朴初,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残疾人及民族、宗教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

赵朴初说:佛教徒有理想,庄严国土,利乐众生。这是菩萨的人生观。要自己觉悟,还要普度众生。这些思想同今天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要做菩萨,觉悟,要有戒律,没有戒律不能解脱,这对精神文明有好作用。我们提出人间佛教,就是为了佛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为社会主义服务。

费孝通对民族经济文化的差距,精神状态和习惯的不同,形成当前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就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回报问题,吸收汉族移民问题,有计划地在民族地区建立几个城市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3月31日,二稿完成。题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三大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十项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与草稿相比较,明显地增强了行动性。

4月8日、9日、11日,胡耀邦三次召集书记处几位书记,科学、文化、教育、宣传、理论界领导同志讨论二稿。王兆国主持了几位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二稿的意见。

会上,于光远说:精神文明建设本质还是创造,要大力提倡创造。马克思主义要单搞一段,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建设、生活和组织建设,要给予突出的地位,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中宣部长朱厚泽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胡耀邦最后说:大家的意见,最大的还是结构问题。一要明白了,二要抓得住。六个字,谈何容易。我赞成先把结构调理一下。怎么调整?一、先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说透。一张皮还是两张皮。要从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说起。说点历史深刻。资本主义历史说不说?说多少?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说不说?我们自己的历史说不说?要把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说得人家信服了。二、讲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建设精神文明有几项要求。10项多了,要求与措施混在了一起。改成五大奋斗目标: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对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要受到全社会的尊敬。2、讲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尊重人的权利、义务、创造精神,焕发民族的创造力。健全法制,正确地约束少数人,保证多数人的民主。3、科学教育。教育是手段,对最新科学成果的热爱与追求,掌握民族发展的命运。4、人和人之间高度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关系。包括不同人群、集团、民族、地区、男女老少、家庭

之间,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之间。5、生活上的丰富多彩、健康活泼。适应时代潮流发展,逐渐克服落后的东西。允许什么存在,什么要克服,界限清楚。办不到的不说。三、采取什么手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阵地、工具和队伍,家庭、学校、社会、文艺团体、传播工具、知识分子队伍。指令性的东西不讲,不要搞指标。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或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指南,不能照搬,要发展、创造。怎么对待外国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对群众精神世界不一致的东西,怎么疏导。不能超越物质文明的可能去要求。精神世界的东西不能强迫,只能提倡、引导。五、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责任。

三稿出炉“有架子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对二稿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既注意了文件的思想指导性,也注意了可操作性。5月10日提出三稿。题目缩短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五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队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看后很高兴,说:完全有希望。有架子了,有80%了。一、二部分特别好些,通俗,论理,逻辑性强,三、四、五部分弱些。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胡启立于5月19日约请参加书记处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对第三稿的意见。赵紫阳、习仲勋、杨尚昆、方毅、余秋里、郝建秀出席会议,胡耀邦去外地考察,邓力群有外事活动缺席。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好意见,认为大架子可以,现在需要从宏观上讲明一些道理,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同“文革”不同,利于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

统一思想。也有同志从实际工作考虑,觉得稿子太宽泛,应当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个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5月23日、28、29日,起草组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央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影视、农村政策、《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广东、湖北和武汉六省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第三稿的意见。

芮杏文在会上结合上海的实际状况说: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人们思想、理论、观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这场改革涉及的问题,要表明党的基本态度,如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观点,还是死抠条文,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法前进。稿子总的很好,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是经济改革,应该挑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杜润生说：从指导思想上讲清问题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要让人们懂得，不可能不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干净的商品经济，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打破大锅饭，是积极的东西。但也须有防范的东西，如果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就不能容纳了；分配太悬殊，人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给人一种开放、开明的感觉，决不可重复“清除精神污染”中某些界限不清的错误，也不要指望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两年内就取得最后胜利。要做长期努力。

胡乔木对稿子作了仔细修改，在许多部分都加写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字句，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在这两次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最好不用。陆定一向起草组郑重提出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文革”中批判他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让龚育之帮他查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协助一查，发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在论辩中最早用过这个提法。刘少奇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刘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随后，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说：“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定一也说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阶级政策。

为此，龚育之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医院向陆定一汇报。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也讲过反对把双百方针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那也是错

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批评不要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这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他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为什么要分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他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陆定一最后说：精神文明写成部《论语》很困难。匈牙利有篇文章讲经济改革一定要同进一步民主化一起进行。这个是对的。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

邓小平：“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

此后，起草组在三稿的基础上，反复磨了几道，准备报送邓小平审阅。

7月23日，胡耀邦同起草组谈话，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所以缓冲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设观念形态的东西。老人家对这个稿子也不会满意，他历来反对长东西。凭对我的信任，他可以通过。

7月25日，提出四稿即送审稿（近两万字），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

方针的决议》。分送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果然不出胡耀邦所料,邓小平阅后表示:六中全会的议题不变。文件不能搞那么长,五千字就可以了。要好好把法制问题讲一下,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很讲法制的国家,上上下下、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都要好好遵守法纪。

胡耀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召集有田纪云、李鹏、温家宝和起草组参加的会议,提出修改方案,结构上重新进行了调整,定为八条,五天出稿子。田纪云、李鹏都表示赞成这个思路和写法。

8月2日,改出送审二稿(近9千字)。题目同前,8个问题是: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三、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四、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五、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和纪律,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八、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这八个问题,除了第五题改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外,其它各条都没有变化。可以看出,总的框架,还是最初设想的“四有”。其它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

当天上午,胡耀邦将稿子送邓小平、赵紫阳。

晚饭后,胡耀邦到邓小平处,一进门,小平正在散步,看到胡耀邦,远远就说: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



邓小平从50年代初就是胡耀邦的直接领导。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后,对胡耀邦的许多工作都给予支持。这是胡耀邦与邓小平商讨一个文件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的意见,作了个别文字修改,于8月3日印书记处会议文件。

8月8日下午,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二稿,,认为可在修改后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0日上午,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他仔细研究了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逐条提出了修改设想。八个问题不变,有些问题要重新组合,有些段落变动大些。胡耀邦在会上谈了两个重要观点。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精神文明,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来。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他还讲,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武器,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指明了方向,除此没有现成药方。马克思和毛主席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恩、列不清楚的地方,许多人拿来攻,老实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没有规范,他猜想了一点

社会主义的规律,猜想多了就不是马克思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否则,思想解放不了。马克思说,他没有结论过啊,你们怎么强加于我啊?社会主义在实践,靠我们去创造。明年十三大讲题为:《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8月12日晚,胡耀邦召集在北戴河的中央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李鹏、陈丕显开会,讨论根据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改出的稿子,一致认为改得好,有的说有神气了。同时提了个别修改意见。一致同意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3日,经再作个别修改后,印出政治局审议稿。

邓小平对决议稿批示:“同意。没有意见。”李先念亦表示没有意见。

8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两点修改不予考虑

8月18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参加六中全会的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以及不是三委成员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一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这次征求意见,党内有2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党外有200多人参加了讨论,改出140份修改稿,其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起草组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反复推敲,吸收了不少好意见,也有一些意见没有采纳。主要是两个意见:一个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不科学,要求放弃这个提法;一个是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否则就是离开了十二大。

对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开始起草文件就主张要写,历次草稿中都写了。后来,查阅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历次论述,重新加以提炼和概

括,在9月1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草案中将这段话最后改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个新的概括,给“自由化”以严格的界说。在讨论中,有19个省、部委以及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从政治上考虑,仍坚定地认为保留这个提法对保持安定团结有利,因此对这个意见依然没有采纳。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语,出自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二大报告。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胡耀邦越来越感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来指导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广泛地动员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决议》在起草中没有再沿用这个提法。在讨论中,有些单位认为应当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同志主持修改的稿子多处引用十二大报告中的论述,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说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畸形的社会。还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我国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并且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还有人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要给资本主义平反。所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会是严重的。

对于如此坚持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写进文件,胡耀邦的态度同样非常明确。他要给中央常委写一封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的这个提法的理由。起草组起草了一个稿子,他不满意;中办几位同志又写了一个稿子,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出一稿送赵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同志表示完全赞成,还提了一点意见,并提出一同署名报常委。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的一点说明

一、十二大报告中用此提法，当时我和许多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为指导，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后来才发现，这种提法不很准确，加上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似乎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还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要求所有的人们。在我们党提出“一国两制”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之后，更感到在一个对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决定的文件中，不用这种提法为好。

二、当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而且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武装全体共产党员，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决议稿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写的。我们感到，不用“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完全可以把这种精神表达出来，而又可以避免那些误解。

三、过去文件说过的话，即使是党代表大会文件说过的话，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有所增新和发展。比如十二大时就没有写商品经济，也没有提出“六五”期间就开始全面改革，后来的文件都发展了，没有再沿用原来的提法，这样做不存在衔接不衔接的问题。

这封信于9月14日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第三天即16日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由他的秘书王瑞林写在上面。

小平掌舵大功告成

9月17日上午，在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

示，谈了近一个小时。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

胡耀邦还汇报说：陆定一同志主张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并向邓小平讲了这个词的来历，说这个词是否科学可以研究，但现在必须保留。几年来小平同志定了一个界限，“自由化”是指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突然取消这个词，会带来某些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敢随便用“自由化”斗人。所以，我倾向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多出现。邓小平说：赞成你的这个意见。并说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多少我不知道。对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反正他翻不了什么天。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系之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9月19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了《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和修改情况（草稿）》（即后来的《简要说明》）修改。胡耀邦说：要把大家提的问题的合理性肯定一下，要求文件要有具体措施是对的。整个文字表述，注意既防止“左”，也防止右，但文字上不出现这字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服力还不够强，要讲出点道理来。我说：同志们提出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考虑

到有了现在这个界说,党内把有这种思想的人打成“自由化”一般说不那么容易了,没那个危险了。所以这次保留这个提法有好处。这样,不致造成开禁的印象,又刮风了。我们要保证安定团结,良好的社会秩序。想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能说没有。第一,不捧他;第二,不批斗;第三,党报党刊不登。党报党刊一批评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运动。

经过修改,题目简化为《简要说明》。笔者手头存有一份9月19日的草稿,全文如下:

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党政群各部门和人民解放军,共一百二十三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约两千多位同志,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九月初,中央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了对《决议》稿的意见。经过讨论,党内外同志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达到了集思广益的目的。起草小组共收到修改意见一百四十份,对这些意见逐条作了研究,对原稿作了修改。

(一)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赞同文件解决新形势下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认为《决议》稿的基调是正确的、稳妥的,是个好文件。因此,这次修改,我们保持了文件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基本提法。同时,根据许多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建议,把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等,表述得更鲜明、突出了些,对原稿的文字也作了仔细斟酌。

(二)一些同志建议,《决议》稿加写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以便于贯彻落实。这个意见,有合理的地方。但是由于文件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加上各地情况很不相同,难以把这些内容都写进去。文件稿中已写了《决议》的实施,由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规划和安排,中央将在这方面加强指导。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根据这个决议稿的精神,草拟了北京市《“七五”期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

(三)有的同志主张沿用十二大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提法。这次修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理由是:

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不吻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以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这个提法使台、港和华侨广大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反而不利。

不再沿用这个提法,丝毫也没有隐瞒或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稿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奋力开拓,勇于献身,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

对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届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实践检验证明不妥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沿用,这种情况在我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次不再沿用“为核心”的提法,也是可以的。正如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指出:“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

(四)有些同志主张不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把自由都归到资产阶级名下去了。看来这个提法,确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这次修改仍然加以保留。理由如下:

这个提法的涵义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决议稿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近几年中央用这个提法,涵义也就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确实仍然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

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这次文件保留这个提法,有利于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

我们全党在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矛盾方面,已经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保留这个提法,不会导致过火斗争,带来危险。

附带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在少奇同志一九五九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使用过,当时是为了答复国内外对双百方针的歪曲,指出双百方针

“决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文革”中,这个提法被用来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拨乱反正以后,中央针对“文革”遗毒、制造动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使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同“文革”时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

(五)决议稿注意稳妥,防止片面,避免引起两方面的误会。有的修改稿多处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防止“变质”等文字,我们认为,《决议》稿对此已作了鲜明表述,无需过多重复;如过多重复,容易造成政策要变的误解。另一方面,又有些同志认为决议稿写了“防止迷失方向的危险”等,就是埋伏了打人的棍子。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对,也没有接受。

9月2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上,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胡乔木、方毅、伍修权、萧克、黄火青、乔石、胡启立先后发言,一致认为是个好文件,比前几稿都好。其最大的长处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密切联系起来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将《决议》(草案)提请六中全会审议。

全会通过决议时的波澜

23日,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分组讨



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夫人李昭感谢共青城的乡亲们

论《决议》草案。起草组根据全会讨论的意见,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于26日改毕。题目最后定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7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先后批示:“同意”。

9月28日,六中全会召开全体大会,胡耀邦主持。由播音员宣读《决议》。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环顾会场问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陆定一发言了,还是那个“自由化”问题。他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很好了。这是我第四次提意见了。他在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在“文革”中彭真和他被批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后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我主张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还留着后面两句,很好嘛。这就同“文革”错误分开来了,去掉那几个字没有丝毫损害。

他的发言引起了掌声。

胡耀邦在陆定一发言后接着说了几句。我对他的发言记了个要点,原记录是:“自由化最早59年少奇第一次用。主张走资的人的确有。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乱戴。一下不要这个词了,会不

会……两方面照顾好,四,改革。”这里“……”中的字,当是影响安定团结一类的话,这里讲的“四”,即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意思是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推进改革开放,两个方面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印象中,他好像也讲过对“自由化”一词到底怎么样,他没有倾向性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这样意思的话。

接着有人发言,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也主张去掉那个词。

接着,又有人发言,主张维持原案。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打击人的方法很多,不只是“自由化”,维持原案较好。他们的发言也博得了掌声。

这时,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维持原案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接着,又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表示同意维持原案。

一场并非所愿,但也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争论结束了。如果胡耀邦能够在全会的大会上果断地坚持确定的方案,制止在是不是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情况也许就会不同了。但胡耀邦面对资历比他老许多的饱经沧桑的革命老人,加上他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以及他一向比较民主的作风,使他没有那样去做。平心而论,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的。就陆定一而言,乃至包括胡耀邦在内,他们对“自由化”这个词的质疑,并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同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两码事。

历史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弄得面目全非。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不久,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六中全会开会那天,决议稿中有一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搞资本主义制度”。陆定一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边即这句注释删掉。这里显然是把陆定一发言的意思给弄拧了,陆定一明明说的是把“即”字前面的话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去掉,保留“即”字后面的话,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他主张去掉“即”字后面那些话,这样他就成了不主张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了。

后来又有别的说法,说什么胡耀邦不愿意提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把文件(讨论稿)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删去,受到批评后才加上去的。

胡耀邦别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单就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事实是,胡耀邦在文件一开始就多次强调要写上四项基本原则,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的定稿没有哪一稿上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哪一稿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对有同志要求文件到处加上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不赞成。他说:我就不相信,写几次不算坚持,写几十次才算坚持。他还说:不能说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坚持就是半马克思主义,三个坚持才是马克思主义。

经过时间的考验,《决议》的价值已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文件俱在,不需要我多说。《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也区别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为我国社会进到民主、文明的更高程度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

岁月的流逝,会抹去人们的记忆,但也会使人们对往事看得更加清晰。

(2005年9月25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

——纪念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体制改革这三项决定性的工作中，胡耀邦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其后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胡耀邦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但是，自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不久，到1994年4月之前，本刊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媒体一样，几乎完全不提胡耀邦的名字。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

1994年4月，胡耀邦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下，本刊发表了几幅他的照片，还有几行白话诗。随后又组织了一系列他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今日看来，这些事很寻常，但在当年却也很不寻常：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胡耀邦的崇高评价只字未改；另一方面，与他相关的一切又笼罩在一片静寂之中……

如今，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这位伟人九十诞辰，而历史也进了一大步：当年的不寻常也寻常了。读者、作者和编者欣喜这种进步，欣喜这种寻常。因此，半年多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纪念耀邦九十诞辰的来稿。本期我们先选编了这些来稿的一部分，作为对这位伟人九十诞辰的纪念。



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 田纪云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想,用这十六个字,“无私无畏 光明磊落;丰功伟绩 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部长,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兼任中宣部长等职。在邓小平等老同志支持下,胡耀邦以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历史性的工程。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他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禁锢,促进思想大解放,而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昭雪,数千万计受到株连的人新生。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怎么可能办得到?)

我以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还为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做了舆论准备。

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我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九年,他卸任后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

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的。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深切的怀念

● 杜润生

耀邦,为人胸襟坦率、真诚,能向同志交心。“我作为团中央书记,理应跟党走,批刘批彭,也不能逆潮流而拥护真理!”他曾多次自我检讨。他在上任总书记会时说,职务变了,我胡耀邦还是原来的胡耀邦,要靠集体领导。

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大跃进以来人们就高唱以粮为纲,但粮食却濒临危机。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耀邦力主发扬民主。他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

耀邦心脏不好,但还是不辞劳累深入农村。

他曾约我在两年之内走访所有地委。我们确实基本上做到了(在地图上作了标志)。实际上他比我多走了青海和西藏两个自治区。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耀邦同志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听取各地方同志汇报工作时,听到他们过多诉苦时,耀邦往往即席给予善意的批评:我们干革命,就得知难而上,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可知难而退。

耀邦政治上勇敢,看准的事,勇往直前。在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他与赵紫阳密切合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功勋卓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耀邦,提倡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持了实事求是路线,受到党内外赞许。他还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两件大事,使千千万万的人洗却了政治沉冤,挣脱了思想桎梏,为进入新时期作了准备。

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陆铿谈话有关。但陆铿的报道是否如实,值得重新审视。即使报道属实,也无损于胡耀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当然,像一切历史人物一样,耀邦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他永远活在人心

● 任仲夷

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只读过一年初中。由于喜好读书,尤善博览群书,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因此被人称为“大知识分子”(陆定一语)。

1929年他刚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

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即主张恢复长途贩运;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扣“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破除迷信和平反冤狱两大根本问题,否则,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耀邦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首先做好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件事,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经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当年《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对此体会最深。

由于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耀邦终于被迫“辞职”、“检讨”,于是大哭一场。此种委曲促其两年后郁郁离世,引起世人的无限悲恸。

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2005年10月2日

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 评价这位伟人

● 于光远

我曾经听过一些议论,说胡耀邦虽然对党的

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总的说来,他的政治水平不像人们以为地那样高。他看问题,有时就看不准,不都是很有把握,比较天真。

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把“天真”理解为“纯真”,我认为胡耀邦倒是有这样“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特点。2004年10月我去江西共青城瞻仰的时候,看到李昭书写的这八个字,刻在石头上。这块石头的位置就紧靠在胡耀邦陵园的右侧的后面。

至于说到“问题有时看不准”,这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避免不了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更要注意不要在大事上犯错误。而胡耀邦在党和国家大事情上,思想政治立场是很清楚、坚定并且是很正确的。他做到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九十诞辰的时候就应该为他洗刷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

胡耀邦的确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对做出这样的判断深信不疑,绝不能让自己的科学良心受到玷污。对有意贬低胡耀邦的行为我固然坚决反对,就是对那些仅仅由于对历史缺乏科学研究,受长期流传下来的某种说法的影响形成偏见,无意地去做贬低胡耀邦的事情,我也不能接受。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胡耀邦的思想、行为、水平、性格和为人处世。

不幸和大幸

● 李锐

十六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所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

那场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这两件大事都是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然而,说他是中国的大幸还不止于此。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一九八七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有,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在耀邦领导下

做统战工作

● 阎明复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离开我

们有 16 年了，但是他那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面前，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

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有幸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在统一战线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在耀邦同志主持下，统一战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转变工作作风，从“改造人”到“服务”，造就与新时期相适应的统战工作队伍，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开创同党外朋友合作的新阶段，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拓宽领域，开展海外统战，直接服务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87 年初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后，我们对在耀邦同志指导下确定的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回顾，认为这些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应坚持执行。为此，我们还给全国统战系统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必要继续克服‘左’的倾向。过去在统战系统中，‘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反右很容易搞成扩大化。现在一定要防止用‘左’的方法反右。同时对某些右的东西也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这也是耀邦同志指导我们做统战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的一个体现。

伟人去矣，伟业犹存。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人议论，经过众人议论，最终由众人决定。

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

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援发展商品经济，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深挖翻犁，是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

耀邦的勇猛冲击，体现出革命家智慧和良心和胆识的高度统一。

耀邦是顶着政治天空中的阴霾，拨云雾，迎晨曦，走上政治领导岗位的。

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

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憧憬。

耀邦的逝世，令千万人震惊，悲痛，哀号，惊天地、泣鬼神……

耀邦的消失，让人们猛醒，冷静，清醒，追问，深思……

人们将走向何处？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阳光政治中，经过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答案。

建设阳光政治

● 朱厚泽

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

谒耀邦陵感言

● 吴江

2005 年为胡耀邦九十诞辰。耀邦逝世于 1989 年 4 月。直到 1995 年我才写《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纪念他。耀邦逝世后，骨灰安葬于江西省共青城富华山，有一群众自发营造的陵墓。我于 1999 年耀邦逝世十

周年纪念日前往陵园拜谒,归来写《谒胡耀邦陵园记》一文,兹录其最后一段文字如下:“耀邦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名动历史。而其主政也则郁郁,终至不容,且终于死。苏轼有言:‘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世人惜其死,然司马迁亦有言:‘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死后荣誉属千载之意)。中国古来贤者,大抵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耀邦亦当若是。苍天之下,日月昭昭,公道人心,功过本不足论也。”

今年9月上旬,书法家沈鹏先生突来电话,说中央已批准湖南省浏阳市建“耀邦故居陈列馆”和“耀邦图书馆”,命他书写馆名,他同时建议我也为耀邦故居陈列馆写一幅字以留念。我思之良久,乃录宋·杨万里诗一首如下: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 李普

耀邦去世十六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为什么不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据说拿破仑的传记已经有两百种之多。华盛顿的传记,我书架上就有三种,而且我都不十分满意;难道不可以预期,在我们中国也一定还有人会再写吗?

耀邦功勋卓著。我虽然孤陋寡闻,也知道他做了五件大事,每一件都足以彪炳千秋。

一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答叶剑英的那个俗称的“新隆中对”。他说,全国乱了这么多年,现在人心思定。怎样才能定?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那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依然赋闲在家的時候。

二是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排名最后一位副校长任上,领导和策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讨论。

三是平反全国冤假错案。

四是给“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安排工作。

五是带头支持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开放。

做第三、四两件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做第五件他已经在中共中央主政。

我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改革开放之功。首先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了人们的头脑。一时政治思想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环境宽松起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大大进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可惜这种好形势没能持久,因此人们越来越瞩目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

想必大家都记得,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业的改革开放带的头,这也不能忘记胡耀邦。他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使农业和农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死胡同。那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这五件大事各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既艰难又有趣。

耀邦的一生确实多姿多彩,再说两件事。

一是在苏区杀AB团运动中差一点被杀掉了,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念过一年初中,也算得个知识分子,那还不该杀吗?

另一件事是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小年轻经不住多方逼迫,终于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他这实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才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八十八岁,而是五十八或者六十八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十年时间。

耀邦的一条批示

● 曾彦修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也即打倒“四人帮”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方针政策是结束整整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路线，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路线？是有激烈争论的。胡耀邦是坚决主张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位带头人。

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

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1980）7.21.

这时，耀邦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日理万机，但能收到此件后立即处理，并作了复信，可见他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热情与重视。

耀邦的支持，给了我们信心，工作就开展起来。可这一工作进行了三年时，有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却把这件事列为思想状况严重自由化九条中的第一条，加以指责。罪名是三大项：

反苏反共（反苏，甚至包括契尔年科也在内），宣传托洛茨基派及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我在当年写下的申辩书中写道：“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耀邦的正确！而我们仍需要发扬胡耀邦的精神，把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废除干净。

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 何方

我以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在领导体制上。就是邓小平说的，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此，人们感触极深。连一贯强调集中和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最明显的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两次“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他说的第一次是从“五四”到大革命。这一时期正是由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旗手陈独秀出任总书记。他说的另一个时期是遵义会议以后。这又是坚持“五四”精神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党内生活民主化和理论上的繁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虽然和前两位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有所不同，但也尽力发扬“五四”传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

跟张闻天一样,坚持科学民主,反对专制愚昧;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言论自由。他一再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检查令的文章,并且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他对纪念张闻天的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

建议编《胡(耀邦)选》

● 龚育之

去年四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发言,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我说:

“胡耀邦从一九八〇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这个发言,已经在《炎黄春秋》去年第六期上发表。现在再就编《胡(耀邦)选》的建议作一些申说。

编辑、出版党中央已逝的和高龄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据不完整的统计,出版领导人的选集、文选、

文集的规格,现在有以下几种:

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选集

邓小平、陈云的文选

叶剑英、彭真、李先念、万里、薄一波的文选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并声明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

由本书编委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

习仲勋文选、王任重文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或未说明编辑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邓子恢文集、陶铸文集、陆定一文集(一卷)、胡乔木文集(三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文集(四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有:

李富春选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有:

林伯渠文集

所以,如果说到规格,根据以上成例,《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具体的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或者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或者是以某某选集编辑组的名义,由中央某部门、某单位或某省委组织力量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十一篇,一百九十六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九篇,一百四十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六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当然,还要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

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还要确定以什么时候的哪篇文章作为开卷篇。还要作题注和注释。就是说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但是,既然是“选”,篇幅不可能也不需要太大。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

总之,建议编《胡(耀邦)选》,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胡耀邦与马克思主义

● 钟沛璋

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在他去世时的悼词和讣告中,作了清楚的表述。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而他没有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时曾引起了思考: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认为是一门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是因为它是紧密结合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困落后的国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求得解放,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行事,或照搬外国的经验,都使我们犯过错误,吃尽苦头,遭到失败。马克思针对那些教条地搬弄他的话人说:“反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像康生那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在“文革”中又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死时竟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反正我们知道,胡耀邦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在他十四岁加入儿童团时,的确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革命理想的鼓

舞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在新的环境中勇敢地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经验。无论在瓦窑堡创办抗大一分校,在解放战争中做部队政治工作,解放后在川北剿匪反霸、建立新秩序的复杂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特别是经历十年“文革”大灾难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扭转乾坤,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1977年—1987年十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对这样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开拓,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

耀邦一生作过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他特别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1958年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我就听过耀邦题为《人的积极性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讲话。有人曾要求恩格斯用一句话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恩格斯的回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

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 杜导正

我同耀邦同志有过近十年的工作关系,感触最深的是他的民主作风。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等待人,从谏如流。

在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時候,每周两次召开新闻宣传系统的例会。那时,我是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中宣部指定新华社穆青、李普和我参加这个例会,穆青事情多,李普健康欠佳,我去的较多。每次例会,耀邦自己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分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都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作指示,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

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有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我赞成!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耀邦的民主作风,我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派生出来的。耀邦的这种民主的政治品质,是尊重和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而这恰恰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问题。

古语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其耀邦乎?这是他性格、风格、人格具有的独特魅力。他不愧是我党、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 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 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 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 经全力治疗, 未能挽救, 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 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至194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46年至1949年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18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 他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 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不顾个人安危, 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 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 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 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 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学习他谦虚好学、顾全大局、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198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

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

● 丁龙嘉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邓小平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他指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其中心环节，厥为民主政治之树立与发挥，以及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之认真建设。”“惟有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地巩固各阶层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也才能示范全国，争取人心向我。”他亲自指导建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太联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抗日民主政权，并在指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阐述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

本文试对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思想、民主选举与民主施政的思想、共产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关系的思想作一探析。

（一）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几个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日寇占领区公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邓小平认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他在1939年5月就阐述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以及进行民主施政等思想，1940年3月以后又全面地精辟地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

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提出敌后政权必须是民主的，民主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必须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应以如何战胜日寇和汉奸为出发点。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给民众以抗日的组织、行动与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严厉取缔敌人汉奸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必须是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适当改善民生的政府，这个政府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做到自身廉洁。必须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成为团结各阶层核心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各种政策上要顾及各个党派、阶层的利益，要吸引一切忠诚为国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必须是与人民建立最密切联系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人员应由人民选举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组成。必须是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政府，这个政府应适应抗战的需要。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之后，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1/3或少于1/3，进步势力占1/3，中间势力占1/3，但

不只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内容上,其实质是民主。他鲜明地指出,这个政权“在政策性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段,还要照顾那一阶段,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他尖锐地指出,这个政权中,存在着反映不同利益、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斗争,共产党“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共产党。邓小平的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思想、发扬政权内民主政治斗争的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

邓小平为了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确实体现出民主实质,于皖南事变发生不久的1941年3月,批评冀南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党员包办政权的现象,指出“三三制”的内容,主要是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即使党员少于1/3,也是空的。因此,要切忌党员包办,党员更无杀人捕人权”;“行政机关中还可容纳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的区域,党员还可以少于1/3”;“公安机关不是恐怖机关,而应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在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情况下,他强调指出“三三制”政权“惟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

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约束共产党不能以多数去压倒少数,必须争取其他民主人士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将自己正确的主张通过与各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去实施,这就从组织上保障了抗日政权的民主性质。而“三三制”政权更深刻的民主性质,则体现在这个政权所实行的政策及施政内容上。正因如此,“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实现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所以,邓小平十分重视它的意义,他没有把“三三制”看作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是看得更深更远。他指出,这不仅是抗日民主政

权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

邓小平对“三三制”政权的论述,特别是对“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的论述,丰富了党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指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旧政权为抗日民主政权,是建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任务之一。如何建立新政权、改造旧政权?邓小平一再强调“以民意为依托”,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注重区、村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邓小平还强调民主选举的政权必须实行民主施政。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指示发出之前的1938年,邓小平就亲自领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署的建立过程,首先是组织发动群众组建自己的团体,建立和完善区、村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30多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其次是召开冀南各县代表会议,通过民主协商,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署成立后,在运作中暴露出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邓小平又领导解决这一问题。1939年1月下旬,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枪炮声中,冀南各县政府、民众团体、士绅代表200多人举行行政座谈会,决定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召开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经过8个月的筹备,全区51个县民主推荐出250名代表,举行冀南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经过充分民主,改组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增设了行政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大会之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顾及民众利益的进步的法令和法规。邓小平清楚了解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民主性,所以他说:“冀南政府是民主的,一方面因为行政人员是人民选举的,政府的一切施政,都顾及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有了自己的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可以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人民的意见,以供政府之采择。”

中共中央发出建立“三三制”政权指示后的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受北方局委托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成立边区政府。邓小平在提议中提

出了许多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观点,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参议会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议员组成,不应丝毫草率,致伤民主政治之真正意义”。二是“‘三三制’民主政权原则,为本党所提出,为本党全体党员所忠实奉行的主张”,“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他的这些观点,以及不久后他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为参议员的选举、临参会的筹备、举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月15日,邓小平为北方局起草了边区建设十五项主张。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决定将鲁西三十三个县划入边区,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十五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种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参会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员。边区临参会和政府的成立,将华北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邓小平在指导民选政权中,将区、村民主政权的选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他多次强调“首先完成区、村的民选”,“村长民选是主要的”,“改选政权机构,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在邓小平任分局书记的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村选运动从1941年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村选运动,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等程序,最后选出村长,建立村政委员会。村选运动,是一次宣传和实施民主政治的运动。广大

农民群众通过参加村选运动,懂得了民主政治,激发了参政积极性,许多村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村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95%以上。村选运动,使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昔(阳)东县29个村选出的622名村政委员中,工人(雇工)占7%,贫农占44%,中农占34%,富农占13%,开明地主和商人占1%。经过村选运动建立起来的农村新政权,成为群众利益的真实代表者和抗日斗争的组织者。

邓小平十分关注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他指明政府的施政应表现出是真正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廉洁民主的、改善民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强调要“举善政,兴利革弊”。根据地的抗日政府在民主施政中,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法令和法规,保护人民群众从事各种合法活动,打击敌对势力破坏抗日、损害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保障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调整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邓小平的民主选举、民主施政的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现代政治文明在广大的偏僻的华北农村扎下了根。

(三)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么,党的正确领导原则是



邓小平在深圳市接见党政军领导人

什么？党如何实行领导？邓小平结合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指导，即“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通过政权来实行”。监督，即“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了正确地有效地进行指导和监督，邓小平要求党组织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

邓小平又指出，党在领导抗日政权工作中，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首先，党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保证“三三制”的比例。其次，党要切实指导、监督政权中自己的党团和党员，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政治家的风度，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团结非党干部、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就这一点，邓小平专门阐述了反对“因党而骄”的思想。再次，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政治斗争，纠正某些共产党员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敢于讲所想讲的话，敢于工作，不对共产党产生疑惧。

邓小平在论述上述问题时，尖锐地批评了违反民主精神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和行为。

邓小平批评了有些共产党员的两个误解。其一是批评了有的误解党的优势，以为“党的绝对优势”就是“党员实行包办”。他指出：有些高唱优势的人，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自己的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造成中间分子不满意、进步分子不安、群众的舆论不好。他严厉地质问，对于这种情况，除了阿Q主义者之外，谁还能说党已经取得了优势？他说，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若把优势建立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其二是批评了有的误解党的领导，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权高于一切”。他指出：有的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有的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若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就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

混乱现象。更为甚者，有的将“党权高于一切”发展为“党员高于一切”，可以为非作歹，可以犯法得到宽恕。于是，非党干部中，有的称党为“最高当局”，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抗日民主政权以至反对抗日民主政权。于是，群众认为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脱离了群众。他尖锐地抨击说：“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邓小平还批评了有些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治斗争中“尚简单避复杂”。他指出，“尚简单避复杂”的办法将导致共产党的麻痹和腐化。这是因为，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把非党干部和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进而引起群众的反对；党和党员都会因此而麻痹，从而失掉对于新生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他同时指出民主政治的作用：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党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和决定问题；能够及时反映群众情绪，使党能够从群众情绪中测验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和拥护；能够使党保持对事物的敏感性，而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能够使党得到群众的监督，而避免堕落腐化的危险；能够使党增强能力、接近群众，而锻炼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表现为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所以，他提出要肃清共产党员思想中违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

邓小平关于党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的思想，党在领导政权中必须贯彻民主精神的思想，尤其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在建设政治文明。而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部分。正因如此，重温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 萧 徐）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 李一鑫

中国曾在大约 18 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里 GDP 居全球之首,但其后却衰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会走过一长段大起大落的曲折道路?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一版)、《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第一版)里,我们看到,顾准在上个世纪中叶就以批判精神,博览群书,深刻思索这个难题,并得出了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答案。关于《顾准文集》,已经有了许多读书界熟知的热评,在此不多谈,这里仅就个人近日读《顾准笔记》所作的笔记,择取片段,就教于众。

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700 多页的《顾准笔记》分三大部分: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马恩全集笔记。其中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开卷几页后,我们就看到顾准自问自答:“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一切证据都足以表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 7 页)顾准在追溯历史上一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后,又说:“‘现代化’有许多前奏曲,在某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生地。一旦证明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它就在不同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走现代化的路。”(27 页)他认为:“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专制主义的”。“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息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254 页)这就是说,有现代化“前奏曲”,不一定就有现代化,还要看有没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百余年来中国的革命或改革维新,归根到底是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笔记》的论述,是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这三者,看作在历史上同时发生,互相联系、同属一个范畴的事物,即世界近现代史所昭示的现代化之路。而这种论述,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相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又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诞生以后到现在,再到可见的未来,资本主义文明是相对之下和现实之中最先进的文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的统一,是近现代“一切”民族国家走向文明昌盛的路径。

走这条路径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论述。这本书认为,从 1914 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质起

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就是说,即使如此区别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建国后不过几年,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基本条件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却匆匆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开始。好像执政者一变,一切其他条件,包括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的生产力条件都不重要了。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明确肯定中国应大胆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无非也是要在当前特殊历史环境下,采用普适的经验来实现现代化。这件事之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当初根据对中国正确的社会历史定位制订的正确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曲”很特殊很复杂并且很悠长,这个“前奏曲”应该开始于两千年以前。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仍争议是否应“师夷之长技”,说明只有少数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道,不仅是学习人家技术的问题,而是要改制。建国前后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但只是到了邓小平,“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早在

18世纪就说过,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场的广泛化而发展的。为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工厂制度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使现代工业的规模和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这里所谓现代工业,就是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提到赖以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高度。这一表述,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致化的。

而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他身体与环境都很差的时候,在《笔记》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如下一段话:“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236页)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坏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叫“坏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笔记》30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机器、权力架构,涵盖整个上层建筑。顾准所强调的“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无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上层建筑必须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相结合、适应。

顾准又说:“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羸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起一些绊脚石作用……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27页)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若出现这种不适应,其结果要么是“阻止资本主义生长”,要么是产生“坏资本主义”。

顾准紧跟着提出了不少例证:“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

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27页)

历史证明,在上述这些专制主义威权下成长的资本主义,都是有先天或后天缺陷的资本主义,或称坏资本主义。为了探讨历史的经验,下面我们仅就顾准所提出的几个例证,稍作回顾和评析:

中国,长期号称农业文明大国和一度的海上贸易大国,到清末民初也出现一点新式工业,但在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始终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和思想影响下,国民党也曾是一个志在革旧布新,谋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振兴的党。这也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但在孙中山死后,特别是在国民党成为独裁政权后,则是民不聊生。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畸形发展,严重殖民化。当时那种在十分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生长的城市资本主义,正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是悠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之魂继续附体在国民党身上的结果。

凯末尔,至今被称为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土耳其“国父”。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曾一度被捧为弱国振兴的样板,但其军人执政的传统始终存在。虽然地处交通要害,终归只属于第三世界的稍强者。

路易十四,就是那位公然说出“朕即国家”这句独裁者大实话的人。他支持工商业,使法国得到了发展,同时却又大事搜刮,穷奢极欲,兴建凡尔赛宫,浪费了大量国家财富。拿破仑,是所谓“开明专制”的君王。他大搞改革,振兴经济,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承认“一切公民一律平等”,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并在被征服的国家推行改革,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都将作为敌人对待,以至“革命”到专横程度,终于迎来滑铁卢,反而使欧洲一度重新出现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正统主义”回潮。

彼得一世,俄国第一位改革家。他利用权力,大胆开放,学习西欧。他废除贵族特权,主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人文革命书籍,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第一家报纸,并给予商人和企业主不少优惠权利,使俄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尤其了不起的是他以帝王之尊,见到士兵的船在芬兰湾搁浅遇险,竟亲自跳下水去营救,以致受凉一病不起,颇有爱兵爱民形象。但他又是个率性行事的独裁者,因而



1965年,顾准在八达岭长城

社会并不和谐,引起两次人民起义,大伤了国家元气。

而继承彼得一世帝位的两位女大帝——叶卡切林娜一世和叶卡切林娜二世,也非常独裁。尤其是叶卡切林娜二世,曾以著名的《叶卡切林娜诏令》颁布标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文的宪法,且大力普及教育,改善交通,建立工业城市,决心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继续推行彼得未竟的事业。她曾有心颁行解放农奴令,但很快她就发现,离开农奴主的支持对她不利,立即向传统妥协,并以皇室土地赏赐上层官员,来巩固她的权力基础。最终,她还是被历史归类于违背社会期望和时代要求而崇尚暴力的沙皇之列。

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是,顾准这里指出的人物,不是中外历史上数不胜数暴虐无能的君王,而是一些多少都沾有二重性格、具有一点悲剧性质的改革人物。以彼得第一和叶卡切林娜二世来说,他们都很想接受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适当引入西

欧人文思潮。日后的俄罗斯之所以拥有比较先进的科技和相当强大的国力，与这几位大帝的奠基绝对有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建立起好的资本主义，却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笔专制的政治遗产。这个历史基因，竟然特别表现在20世纪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人物身上，造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大破坏并导致政权崩溃。十月革命恰恰发生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样压根儿缺乏民主的传统与专政理论的结合，加上俄罗斯的下层土壤以及一些领导人（如斯大林）的个人素质，就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这一致命弊害。

但关于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危害，莫过于顾准所指出的拜占廷王朝（东罗马帝国）的例子。拜占廷这个横跨亚欧非、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庞大帝国，居丝绸之路要冲，曾因占尽商业优势而非常富裕繁荣，而商人是它所以强大的重要支撑力量。顾准说它“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于是，与专制制度往往相联系的上层争权，被征服国家的反叛，宗教战争以及人民起义，加上“蛮族”特别是被中国打跑的突厥人的入侵，等等一系列事件，终于造成这个由繁荣转入停滞的王朝的衰亡。顾准说那是因为“有工业和商业，有城市，但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那种在等级会议或议会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帝国’把一切阶级都压倒了。”（262页）

所以顾准说：“拜占廷帝国和西欧比，就是中国和西欧比。”中国曾富甲世界，但也正是由于同样情况，所以不能把优势化为社会转变的条件。顾准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有了某种发展条件却与国家体制背离，精英们出现求变理念却与习惯势力背离，直到变成社会上层既得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背离，是一个何等纷繁复杂又令人不得不慨然兴叹的历史现象！

是的，权威的作用证明，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期，专制的权威人物施用“铁腕手段”推动改革，也往往可以取得成效乃至显效，但顾准以历历不爽的史实说明：“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146

页）西欧资本主义与人文主义革命——民主政治革命同时出现，是历史的要求。“铁碗”改革必须继之以民主政治，才能巩固成效，才能建立一个好的资本主义，否则必定是“坏资本主义”，即吴敬琏先生所指斥的“权贵资本主义”。缺乏监督的权力所衍生的腐败，必定会把政权推向危亡临界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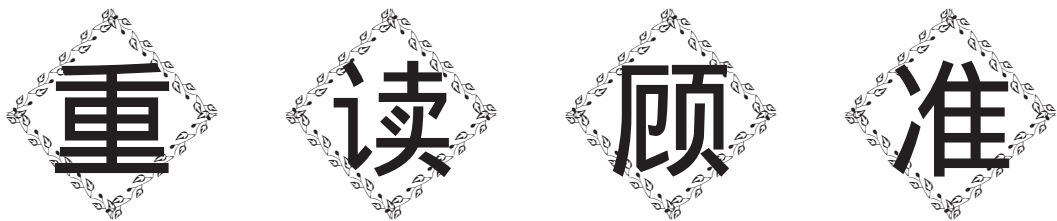
中国昔日强大之术，恰恰是今日复兴的负面教训。东方专制主义的利益原则决定了当时国富民穷——以君王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富，而人民穷。在一定程度上说，往日中国的繁荣乃是一种畸形繁荣甚至是虚假繁荣。一当世界上出现先进制度后，相比之下，这种繁荣的畸形性质就暴露无遗。

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 苦苦求索的思想者

顾准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备受冤案折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类的一片赤忱，刻苦坚毅的为学态度，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当前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道路及前景，获得出色的学术理论成果，从而被誉为“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的思想者。以至不少国内有识之士因为有他而骄傲：“我们中国有顾准。”而他的为学之法，就是毛主席所归纳的“古今中外法”。据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据何其芳《毛泽东之歌》等回忆文章）顾准正是这样做的典范。

《顾准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段落只有一句话。但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当顾准的第一部集子——他受难岁月写给他弟弟陈敏章的信，在顾准死后一些年才得以整理为《顾准文集》出版面市后，因购求者众，很快洛阳纸贵，于是《顾准笔记》也应求出版了。现在堪可告慰于寂寞辞世的思想家的是，四大本《顾准文存》也与读者见面了。人们此时已越来越承认，顾准其人其作，其风其骨，足以作为中国一个时代的理论学术代表传之于世。他是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是中国的良知。

（责任编辑 萧 徐）



——纪念顾准九十诞辰

● 高建国

卓越的思想,往往出自坎坷的人生。顾准的人生之路十分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1915年7月1日,顾准降生于上海陆家浜一条小巷里。他的父亲陈庆华,是从苏州移居过来的棉花商人,兼做中医,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妻。顾准是二房长子,作为母系的传宗人,随母亲姓顾。

由于家道中落,生活日下,顾准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现代会计学之父潘序伦的事务所当小学徒。顾准在那条以英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为潘序伦油印讲义时,通过刻苦自学,以天才少年的聪慧脱颖而出。潘博士惊讶地发现后,甘当伯乐。勤慧超群的顾准,十四岁那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挑起了养活一家老小的担子;十七岁出任立信会计学校部总负责人,并创办中国第一份会计学刊物;十九岁又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大学通用教材……成为中国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青年顾准志不在此。畸形的租界文化,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日寇入侵上海,催熟了他的救国心。他充满激情的追求,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和平、自由而公正、民众普遍幸福的理想国。30年代,正是赤潮涌动于世界的时代。就在《银行会计》广泛发行之际,1935年2月,顾准经宋庆龄的救亡工作联系人林里夫介绍,不顾当时的政治危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处于职业巅峰期的顾准,又主动放弃在上海法租界一边当会计专家,一边从事地下活动的生活,毅然奔赴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苏南根据地。那时,顾准既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

柱子,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大学——圣约翰、沪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讲师,每月都有四百多块钱的极高收入,稳居社会金字塔顶层,被誉为“潘序伦第二”。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从此走上了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准随陈毅回到上海,以开国功臣的喜悦之情,出任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并兼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顾准为振兴上海的经济,八方奔波,日夜劳碌。举世闻名的跑马厅、跑狗场、沙逊大楼……也是他以征收地价税的方式,从外国人手中合法收归。

谁知,共和国刚渡过第一道经济难关,厄运便悄悄向顾准袭来。

“恶劣分子”——“右派”——“极右派”

这与一场税收方法之争有关。大上海是按照解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口头协商议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还是派出财税专管员和注册会计师,去各家企业查账,根据税率来征收税款?上级部门坚持采用解放区的办法,理由是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顾准却顽强主张由他制定且已实施的后一种办法,并在辩论中态度激烈。虽然今天全中国税务系统,都沿用顾准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但在当年,他却因此被视为“目无组织”的“恶劣分子”。

1952年2月29日,在没有公布任何事实的



1974年，顾准在建国门内大街自己的住房前。《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在这里撰写的。

情况下，顾准被冠以诸多罪名：“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作风上一贯恶劣”，“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被登报撤销一切职务。

顾准后半生的多舛命运，从此开了头。

1957年，顾准刚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上，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上纲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又因他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公然发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识分子“右派”的言论，并曾经议论毛主席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康生亲自点名：“新账老账一起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

顾准在商城劳改期间，遭受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待遇，经历了他自称的“恐怖与屈服时

期”，却在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之际，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顾准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集中营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他并以憬悟之心对自己说：“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

中科院组织恐怕顾准会饿死在信阳农村，于1960年初，把他转往北京郊区劳改。顾准告别铁佛寺集中营时，紧紧捂着腰间的破挎包——挎包里有他珍贵的日记本，和当地“右派”徐云周送给他、可当一顿饭吃的胡萝卜。顾准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离开信阳农村时，“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我禁不住一阵阵心头绞痛，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啊！”的确，顾准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信阳事件”了。可以说，是信阳民众的血泪和怨灵，推动他站到了思想家的神圣位置上。

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宽松的氛围中，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所长孙冶方和政经室主任骆耕漠，都是他的老友，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则是他的新同事。在被老友和同事保护的環境中，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与政改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这段时间，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制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

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顾准其实就是以理性拓展的历史眼光,对可能以群众运动方式,再次追求公社化与直接民主化的“文革”,发出了预警。

请看顾准精心翻译的这段文字: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各种职业的人,都将“进入某种癫狂状态,企图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那时,“公民在政治事务上,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那些“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对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就愈加能够改变甚至“创造出人民的意志”。“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预先健全民主法治制度。

可是,未待这部译著出版,顾准便因不断“唠叨”信阳事件,以此证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张闻天是大错误,并因与清华、北大一些学生进行“出格”的理论探讨,于1965年初,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

生命不息,思想探索不止

矢志走在思想探索之路的顾准,在“文革”浩劫中,又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折磨,并遭遇了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绝关系的人间惨剧。

1969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顾准来到设于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的“干校”。这里与顾准十年前呆过的商城,同属信阳专区。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未能彻底纠正,中国又搞起了“文革”!顾准望着这片熟悉而广袤的黄土地,望着辛勤耕作却难以吃饱的农户,联想到祖国的前途和自家的命运,心中充满哀痛!他是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人,亲见亲历共和国接连发生大悲剧,怎能不以个中人的深切感情进行反思。心痛达到极致,便是理论的开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大树的绿色萌芽,随着东岳田垄中瘦弱顽强的麦苗,一起破土成长。思维特有的活力,也拯救

了这个常在梦中思念亡妻,“醒来犹留呜咽”的伤心汉子。

同在息县东岳“干校”改造的,还有俞平伯、钱钟书、吕叔湘、胡厚宣、金岳霖、夏鼐、骆耕漠、巫宝三等“牛鬼蛇神”。顾准被称为“垃圾中的垃圾”。可是,那时便与顾准经常交流的吴敬琏,却回忆说:“顾准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他被造反派批斗、殴打时,冒着雨点般落下的拳头,昂首高喊‘我不服,就是不服’的情景……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犹如一句古谚所说:不化灰烬,便成真金。

赵人伟、陈瑞铭、徐方等多位同住“干校”的人士,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曾睹闻顾准对“文革”的批判、痛斥。顾准在“息县日记”中留下的那些自污文字,只可能是迷惑监视者的障眼法而已。倘若后人据此猜测,还有一个认同“文革”、鄙弃自我的顾准,那是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环境,对“虎落平川”被迫采取的生存方式,缺乏历史性理解。

1972年夏,“林彪事件”迫使“文革”暂时降温。顾准带着他用各种隐蔽性文字记录的心得体会,在河南老乡关切的目光相送下,离开明港“干校”,返回北京。

顾准在息县劳改时已经常痰中带血,回北京后病体更加虚弱了。可是,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奔赴思想战场。犹如义赛亚·伯林所说:“当正义与非义交战时,知识分子不能以中立者自居。”一俟条件许可,顾准便要举起他的如椽之笔,为被暴力和强权侮辱的思想学术,作出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反应。

顾准端坐在北京建国门外一间斗室内,挥笔撰写他的思想著作。他把总题目称为“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鲁迅1923年反思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起超现实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时,曾采用过的题目。顾准此处之意:左翼革命胜利以后,应当怎样理性审视一切?他想与他昔日亲自参与策划送葬的鲁迅,遥隔历史长河,进行一场冷静的对话。

顾准言简意赅地阐明:人本主义就是现实世界的惟一信条,“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应该确立为革命与改革事业的至上追求,理想主义也可以包含在经验主义之中。顾准入木三分地指

明:在追求历史进步的渐变过程,应该把以多元求发展、求和谐的原则,“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

顾准的思想磁石效应,吸引了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曙光、张卓元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张纯音是顾准在学部八号楼的邻居。这位善良而睿智的女学者,几乎每天协助顾准梳理学术思想,做顾准忠实的第一读者,并以相知相契的心灵倾注友情的热能,激励顾准攀临思想的奥林巴斯山。当年围绕在顾准身边的学者都说,“文革”以后,他们能齐刷刷地站到中国改革最前沿,与“文革”中间学于顾准密切相关。

顾准的特殊魅力,还在于他的预见性。他身处“文革”荒唐岁月,却已预见到“文革”失败后,中国定将掀起全面改革热潮。他高瞻远瞩地谕示后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互相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最终会发现,无法拒绝接受资本主义诸多长处。这样,还不如主动向资本主义学习,包括大胆引进它的个人本位文化,进行人文重建。可是,顾准同时指出,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生来便具有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与积累,忽视社会公正的天疾。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既有模式,是更高层面的思想问题。而中国的东方属性,更限制中国简单仿效西方。中国未来的改革家,实在应该比二百年前的英国人聪明一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走得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顾准并不是杞人忧天。他那时正在狭小的斗室遥想未来,生出如许深忧远虑:他深恐他期盼已久的市场体制一旦被迎进中国,长期恪守群体伦理的中国人,会突然从此极端滑向彼极端,误把损人利己、掠夺大众、破坏社会公正,也当作合理行为。为此,顾准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未来全态时,预先布置赵人伟和张纯音翻译外国文献,深入研究“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平衡关系。而这,只是他先知先觉的问题之一。

最让今人惊叹的,也许是顾准对21世纪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的前瞻思考。他以平实的语言指出:应当以“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看待眼前这个地球。他说:“到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

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顾准其实就是以他的先见之明点拨后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以有多元样式。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大量“亚细亚”特征的中国(顾准五十九年生命的绝响,便是一篇论述“亚细亚”问题的专稿),要在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的前提下,正确规划21世纪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与东西方多元文明,在全球平台汇聚而成的“平行四边形”,也将把色谱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蓝图,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

顾准对20——21世纪中国深化改革,以及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超前三十年作出的批判与独创性阐述,准确周全而极具扩展性的预言,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

顾准并非没有失误。当顾准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时,曾因缺乏充足的第一手资料,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是,顾准毕竟是顾准。他同时鲜明精辟地指出,中华文明讲究自然发展、反唯理主义的那种“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民本主义”、“诚信”、“养气”等理念,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历史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大的好处”。顾准的这些告诫,启发我们提升认识:中华文明既有与现代化相忤的一面,也有可向“更广泛的‘现代化’”转化的一面。

顾准曾经握着那支杆身已经发毛的钢笔,对身边的友人说: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他并微笑着说:我在思想研究上每有突破,就觉得身上活力倍增,对现在的生活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看到了阳光照耀下的未来世界。

对人类历史的穿透性理解,使顾准胸中如有百万兵。他经常用嘲讽的睥睨的目光,审视满街象征专制与欺骗的“文革”标语。他举笔立下庄重的誓言: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谁知,正当顾准挥舞思想巨镰,在他用心血浇灌的那一片金色麦地上,迈开矫健的步伐,酣

畅地收割时，早已隐藏在体内的晚期肺癌，却以崩山裂地之势向他袭来！他不断咯血，持续发烧，呼吸也变得越来越不畅通了。

顾准患的是“中心性肺癌”，鸡蛋大小的癌肿，已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扩散。癌细胞疯狂地吞噬顾准的肌体。顾准有时一次吐血，便多达三百毫升！可是，当他被朋友们送去医院前，依然斜靠在床上一边喘息，一边编写待用的思想卡片。据后来整理这些卡片的顾准之子高粱（顾南九）介绍，卡片上写有如下内容：“甘地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红了眼睛，我也要保持理性的头脑”。

由于顾准那时（1974年）仍是“反革命”身份，病危至此也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观察室苦熬。这时，依然靠边审查的骆耕漠，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也为了争取让顾准重新握笔，拄着拐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关系，把顾准送进了病房。经济所那些善良的学者，和林里夫等旧日老友，也不避嫌疑来到医院，为顾准组成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分三班倒，轮流照顾顾准。以往，是他们诚挚的友谊，帮助顾准渡过漫漫严冬；如今，是他们不变的真情，为顾准送来临终慰藉。

顾准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当时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在污泥中虚度了失败的一生。他相信，是真理总要放光的。顾准把手稿分成两部分，研究人类第一个民主机制的《希腊史笔记》，托付给弟子吴敬琏收存；其余的由六弟陈敏之保管。顾准运足力气，用沙哑的声音对吴敬琏说：“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啊。”“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日本战后的突飞猛进——引者注）是一定会到来的”。“总有一天，中国要发生变化，你要拿得出东西来报效祖国啊！”顾准这番话，也是对所有传火继薪者的嘱托。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春蚕丝尽，大江



1974年顾准（右）与弟陈敏之摄于北京日坛公园

波息。顾准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微弱的声音叮咛在他身边护理的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心中，永远没有他自己。

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播撒在北京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他始终记挂着未竟的科研事业，他认为这条无名的小河，可以通向大海。顾准骨灰的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老山骨灰堂。老山四周风动寒草，黄土愀然，落木萧萧，长烟阑干……

重新认识顾准

历史的长河千回百折，终究趋向光明。1976年，十月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结束了。以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改革家，坚决冲破束缚中国人民的“两个凡是”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顾准的形象也被重新认识。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顾准彻底改正两次“右派”结论，恢复政治名誉，并恢复中共党籍。经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发文，又

为顾准“三反”冤案彻底平反。顾准的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张劲夫并于其后撰写了纪念顾准的特稿）。顾准直至临终也未能见到的五个子女，以无限忏悔与追念之情，把祖国大地上重放的鲜花和泪奉献于父母亲灵前。各界人士含悲默诵：愿悲剧不再，愿浩劫不再。

顾准的长女顾淑林，一夜又一夜仔细阅读父亲用那一笔娟秀字体写就的思想遗稿，深受震撼：“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过来的呀！他的深刻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就包含着更多的真理。”顾淑林随即向自己、也向世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乃至社会再做蠢事？……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能这样面对历史的人，无愧为顾准的子女！

经陈敏之、吴敬琏等人多方奔走，顾准的思想遗稿，分别以《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于80年代先后正式出版，并以复印本、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各大学校园。如果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顾准旋风”，一点儿也不过分。人们展读顾著种种，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才气由衷折服，也对他长期忍受地狱之火煎熬，却以非凡的胆魄探索未来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跨入21世纪以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的研究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而顾准当年凭借宏大知识背景所进行的真理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顾准的传世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永不熄灭的航灯”。

诗人邵燕祥这样描述顾准曾经发生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

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的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正在发生的影响：“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考”；“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而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李慎之，这样估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顾准是不朽的。”

顾准的思想宝库远未被充分开掘，21世纪，我们将不断与顾准对话。

（责任编辑 萧 徐）

欢迎订阅《文史春秋》杂志
邮局订阅代号：48-93

内容丰富
特色突出
权威可靠
图文并茂

《文史春秋》杂志是一份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办刊宗旨的纪实性文史类综合期刊，重点刊登中国和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鲜为人知的史实。有内幕秘闻、人物春秋、名人写真、将星陨落、见证历史等栏目。

月刊
全年定价 60元
大一开本

地址：广西南宁市桃源路3号
邮编：530021
电话：0771-2836920 2838192

文革前上海党政关系的争论

● 范征夫

这场党政关系争论的时间是 1958 年到 1962 年,争论的内容是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一元化、党政不分”的通知。争论的一方,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又任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另一方是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曹荻秋以及几位党员副市长。受到这场争论影响的有市区两级机关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现将这场争论的经过回忆如下。

争论的引起

事情还得从 1955 年 12 月曹荻秋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说起。他到任以后,发现党政机关职责不清,政府部门分工不明,行政效率低下。对此,他在一次市人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说:“我来上海的时候,陈毅市长说,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要我负责把它抓起来,市委也委托我来管,而我有许多工作还没有抓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令大家非常感动。他还教育干部:“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许多是通过各级政权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并贯彻下去的。我们一定要把政权工作搞好。”他还特别指出:“只有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上海一千万人的积极性,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他这些精辟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政关系及人民民主政权作用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一贯的工作思路和作风。在他亲自主持下,多次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发扬民主,于 1957 年 1 月 23 日由市人民委员会正式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地方政权组织法的精神,明确市人委对全市国家行政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明确市人委各委、办、局及各区县之间工作分工,制订了几项会议制度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发布以后,受到市、区广大机关干部欢迎,认为党政关系明确,工作职责清楚,能够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此市区两级政府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

可是好景不长,1958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下发后,上海的情况发生了“风云突变”。中央通知中除宣布各小组负责人名单外,还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引自《周恩来传》下,1396 页)

上海怎样贯彻执行中央这个《通知》呢?在领导层思想上存在不同观点,这场争论由此展开。

曹荻秋承上启下 柯庆施另起炉灶

起初，荻秋同志要市人委办公厅替市委起草一个贯彻执行的文件，他交代我一方面要把中央通知中主要精神写上去，同时要考虑到市人委1957年1月公布的《规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发挥政权工作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体会荻秋同志矛盾的心情，他既不得不执行中央通知精神，同时又顾虑，怕把他前一阶段工作成果“化为乌有”。于是，我请示曾涛秘书长，这个文件内容如何写为妥。他考虑再三对我说，文件名称也仿照中央的办法，题为《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各小组的通知》，在简要引述中央通知中“一元化，党政不分”大政方针后，就提出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即财经组组长曹荻秋，政法组组长许建国（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科学教育组组长刘季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文化艺术组组长石西民（市委书记处书记），外事组组长许建国（兼）。他说，这五个小组长中有四个是副市长，他们具有党政双重身份，他们做的决定或签发的文件，符合国家法律程序。曾涛还特别交代，还要写上“凡须召开市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律由各小组组长提请市委决定后召开。”我对曾涛秘书长这种政治智慧非常佩服。文件草稿出来后，经荻秋同志同意，并征求几位党员副市长意见，大家都表示认同，我们于1958年7月14日打印报送市委。

这个草稿送到市委以后，近一个月毫无信息，有一天荻秋同志以很不愉快的心情，告诉曾涛和我，“柯老对我们起草的文件，非常不满意，他要找人由他口授另写。”果然，1958年9月19日我们接到市委133号文件，题为《市委关于市人民委员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开头只用了“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贯彻党政不分的原则”两句话，就开门见山作出四项重大规定：（1）今后各局工作应直接向市委或市委有关各部委请示，各区县人委应直接向区委县委请示；（2）市人委各办、委，市属各局（处）院、行，凡必须以市人委名义发文者，一律送市委有关各委、各部正职签发后，交市人委办公厅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3）今后市人委不再召开区、县长会议和行政会

议，一般也不再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但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应定期召开，除讨论市委已经决定问题外，可以组织有关局工作汇报，或典型经验报告；（4）市人委办公厅编制人数应减去三分之二，原有各副市长秘书组撤消。最后，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立即贯彻执行。

很明显，市委这个通知与中央通知内容有很大不同。既不说在上海设立五个小组，也不讲“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从它的标题和具体内容看，矛头似乎是针对1957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的。对此，荻秋同志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制订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当时，我们也向邻省进行了解，他们均依照中央通知成立五个小组，组长都是党员副省长，省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仍照常召开。保留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之权。由此可见，上海当时贯彻中央通知的做法，是“与众不同”。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柯庆施的一个“独特创造”。

按照市委133号通知，市人民委员会基本被“架空”了，它还能做些什么事呢？柯庆施指示，要贯彻毛主席“虚君共和”的指示，今后市人委应“搞好四个关系，办好法律手续”。即搞好与外国人的关系，用市人委名义接待外宾，搞好与外地的关系，接待外省市来沪接洽业务的人员，搞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接待人民来访，处理人民来信，搞好与民主人士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听取一些工作汇报，但不能讨论决定问题。办好法律手续，即市委各部、委正职负责人签发的文件，要立即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这样一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市人委的职权，就被柯庆施签发的市委通知“一笔勾销”。柯的上述指示，我们向机关干部传达，并不折不扣地执行。

问题的初步暴露

市委133号通知下发后各级党政机关雷厉风行，全面贯彻，谁敢说个“不”字。但执行一年以

后,问题逐步暴露,引起了党内外人士的强烈不满,议论纷纷。

首先,市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基本停止,原来法律、制度规定应该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行政会议、区县长会议,均全部停止召开。市人民委员会会议,虽然仍保持每月一次,但不能讨论决定任何具体

政策、法令,只能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空发议论。因此沈尹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青年》杂志编辑,著名书法家)委员说:“我是挂名委员,尸位素餐。”有的委员也反映:“我这个委员只是‘装装样子’,不起作用的”,实际上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有些市人民委员会党员委员,对会议也不重视,经常缺席。甚至有些局长也不愿到市人委会议上作工作汇报。他们说:“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后,政府工作中重要问题,已由各局直接请示市委或市委各部委决定,再拿到市人委来讨论,岂非形式主义。”这些均从不同方面表示了异议。

其次,市人委原几位副市长,分工负责某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基本落空。他们过去经常召开会议,传达市人委政策法规,主持讨论决定问题,也不时批发文件,他们觉得还是有职有权的。但市委133号通知下达后,他们一下子空闲起来,有职无权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要求到基层走走,开阔眼界。1960年2月,曾涛秘书长调走,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来兼任市人委秘书长,他向荻秋同志建议,同意非党副市长们到基层参观工农业情况,也可请他们主持召开一些专业座谈会,讨论解决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关心的具体问题,免得他们在机关“坐冷板凳”。荻秋同志同意宋的建议,并交代非党副市长的参观座谈,就由市人委办公厅具体组织。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协助过金仲华副市长(分工管理文教工作),座谈研究过知识分子提出的笔墨纸砚供应困难的状况,为此,我们曾和本



曹荻秋(左)与范征夫

市及外省一些单位反复协商,解决了上海“文房四宝”供应困难的老大难问题。

再次,一年多来,市人民委员会公文大为减少。以1960年和1957年比较,总数下降了23%,其中各局、各区县来文减少了58%,主要是他们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公文一件也没有了,其他来文均为一般性抄件。而同一时期市委(不包括各部委)发出的正式文件,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10倍,主要是原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文件,均全部转报市委,请求批复。因此,有些干部反映,一方面是市人委机关“门可罗雀”,另一方面,市委机关(主要是部委)“门庭若市”,不管是政务、业务,大小事均要向市委请示汇报。我记得连各报社发记者证这样的具体事情,新闻出版部门都不能作主,市人委办公厅更无权过问,最后也提请市委有关部委办理。

上述问题逐步出现,党内外议论纷纷,传到荻秋同志耳中,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市委领导人面前,严肃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据原地下党市委书记、副市长张承宗事后著文披露:当时荻秋同志在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上,讨论党政关系问题时说:“这几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很多问题,大小事都拿到市委来,市委日常业务太多,不可能搞好工作。”他在会上还郑重指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党政不分的做法,既削弱了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有的作用,也削弱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引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3

期 21 页) 尽管荻秋同志这些正确意见, 得到一位书记和几位党员副市长的赞同, 他们也希望早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但在当时全国“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 加之盛行“第一书记挂帅”, “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下, 上海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 一时还很难扭转过来。

“否定之否定”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 当市委每天忙于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业务时, 不仅书记们、部长们首当其冲, 不胜其烦, 作为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也感到无法忍受。触发点是黄浦区送来一个报告, 要求市委批准在南京路新建一个厕所, 公文传到柯的手里, 他看后非常恼火地说: 这样小事也拿到市委来解决, 怎么得了! 以后, 在几次会议上他批评“党不管党”, 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碰乱撞, 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他只字不提。此时, 荻秋同志乘机建言, 是否要市人委办公厅组织一些干部, 到几个区县调查一下基层在党政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 得到柯庆施的同意。于是决定由我带领两个小组, 在 1961 年上半年分赴黄浦、闸北两区, 上海、南汇两县进行重点调查。

为了使区县领导能配合我们调查工作, 我煞费苦心, 精选了十多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历史上中央有关党政关系的论述与决定, 编印成《关于党和政权关系的学习资料摘录》, 调查组八名干部先学深学透, 提高认识, 大胆地去发现问题。区县委领导, 在看了我们送去的这个学习资料后, 结合这几年切身感受, 他们认为党政关系必须迅速调整, 目前以党代政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切实改变。有的区委同志, 重温了毛泽东《井冈山斗争》一文指出的“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 党在那里直接做了, 把政权机关搁在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 是要避免的。”他说, 这不是今天上海党政关系的写照吗? 1958 年以来为了搞“大跃进”, 就把政府搁在了一边。有的区领导重读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颇有感慨地说: 即使战争年代十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 但也“明确规定, 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 党

政不分的现象……必须纠正”。难道在和平建设时期, 还要重犯这些老毛病, 就不能很快纠正吗? 在调查组同志与区县委领导同志思想一致、协同努力的前提下, 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 写出了一份《关于党政关系调查的一些情况》的简报。

其实, 区县存在的问题根子是在上面。例如, 区的各种行政会议, 完全停开, 甚至连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按期举行, 以致有的县长, 虽然到任, 由于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因此出布告时仍用老县长的名字, 新县长自称是“黑头县长”; 有的副区长因无事可做, 发牢骚说: “我被安排为区人委当副区长, 是‘福将’, 地位高, 工资大, 而工作很少, 享享清福”; 有的群众风趣地说: “在基层不是党委决定, 各方去办, 而是各方决定, 党委去办”; 下面申请几尺布、几斤粮, 动用几元的经费, 都要由党委部门直接处理; 有的区在调整商品价格时, “财贸部长忙通宵, 商业局长睡大觉”。总之, 我们所到之处, 区县委领导, 强烈要求市里迅速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 并主动提出许多改进意见。

这份简报直接报送市委各位书记、常委, 柯庆施看到以后, 没有表态, 也没有对简报内容提出批评, 荻秋同志与宋季文副市长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 立即要我组织几位同志, 为市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我们反复斟酌, 十易其稿。这时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召开,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呼声高涨。大家认为, 改变上海党政不分的不正常状况的条件已经成熟, 该稿经荻秋同志、宋季文副市长等审核同意后, 于 1962 年 5 月中旬, 提请市委讨论。由于柯庆施外出没有参加这次市委会议, 荻秋同志主持讨论这个文件时, 几乎一致通过, 只有个别人提出加上“试行草案”字样, 荻秋同志电话向柯庆施汇报, 他表示同意, 并要荻秋同志代表市委签发, 于 7 月 28 日以市委名义发出这份文件, 这个《几项规定》既是恢复与发展了 1957 年 1 月市人委发布的那个规定的基本精神, 又针对 1958 年市委 133 号通知的几项要点, 作了逐条否定, 特别明确党政部门的各自职权, 不得以党代政。所以参加起草的同志说“这是否定之否定”。1962 年 7 月, 党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份报告, 明确指出: “在省、地、县以及公社党委, 取消分管书记的名义(如工业

书记、农业书记、财贸书记、文教书记)改变分兵把口的现象,把应由政府各部门办的业务,交由政府部门办理。”这对上海说来是个好消息。在这样政治空气有利的情况下,上海党政关系有了明显的转变,党不管党,以党代政的现象得到了“暂时解决”。但大家知道,要真正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谈何容易啊!

事情到此,似乎了结。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四人帮”张春桥一伙,又把荻秋同志调

整,理顺党政关系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搞第二中心”,“与市委分庭抗礼”,“向柯老夺权”。荻秋同志因此遭到严重迫害,含冤逝世。连我这个参与起草的工作人员,也被打成“陈(丕显)曹(荻秋)死党”,是“反党篡政”的帮凶,“黑笔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荻秋同志才得到平反昭雪,其他遭到“四人帮”迫害的人也得到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18.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5.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6.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6.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6.00
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	吴 江	25.00	5.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5.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 1600 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大包干。作者参与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核心决策。本书记载了亲历、亲闻、亲见,而且语气简练,生活具体,见解深邃,如作者著名的演讲风格,对于想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人,本书堪称宝藏。

《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本书的内容多属于对 20 世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作者回顾了六十多年来的主要经历,以历史责任感的情怀,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史实,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研究。读后定会使人有所收获和思考。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 20 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 刘仰东

今年夏天来得早,一入夏便屡遇40度上下的高温。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笔者带着“淮海战役”这个话题到莲花池总政干休所拜访史超老人,尽管酷暑难耐,史老却兴致盎然,语调爽朗,神情格外投入。他笔下的电影作品《五更寒》、《秘密图纸》、《在被告后面》、《大决战》等等,早已家喻户晓。事实上,在投身电影创作前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史超一直随刘邓大军转战,1948年秋天,在刘、陈、邓等“总前委”首长身边参加了淮海战役。三十多年以后,他又接受了再现淮海战役的电影《大决战》的创作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生的巧合。那么,在这种巧合的背后,他是如何亲历淮海战役的?他又是如何创作这部电影的?同样不能不引起我们探问的兴趣。

淮海战役之前

抗战胜利后,正在“抗大”四分校三大队当教员的史超,和三大队全体人员一道奉命从陕北开往东北,途中又接到命令,转调晋冀鲁豫军区,来到了华北的邯郸。大队长任白戈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史超任文工团团长,政治部主任由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兼任。

不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进军。军区机关的干部都分配到地方工作。史超来到河南新县一个环境极为凶险的区,参与政权建设。苏区时代,这里作为白色堡垒,都没能被红军打开。史超回忆说,当年刘邓部队在大别山,伤亡相当惨重,敌人经常化装成老百姓,怀揣盒子枪,暗中放冷枪。他们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晚上一般不在村子里留宿,多住在山上。他还记得,有一次被敌人追击,跑了几十里路,连饿带累,进了一个村子,看见老百姓的灶台上冒着热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掀起锅盖伸手就抓,烫出了一手的泡。

在大别山,史超的一次遭遇,和后来他在淮海战役中的一次经历多少有点关系。有一次他随刘邓大军直属部队过汝河,河不宽,但上有飞机接力式地狂轰滥炸,后有追兵,河对岸还有敌人一个师在阻击,就是过不去。好在对岸廖运周师迫击炮的炮弹总是在离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爆炸,始终没有目标感。在强渡过河的我军一支部队炮火的掩护下,他们终于过了河。这时,飞机上射下的子弹将史超手背上的血管打破,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是拼命地跑,有时用手擦擦脸,结果是浑身上下连泥带血。史超跑进一个村子,老百姓早已撤离,当时渴急了,他从缸里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就往肚子里灌,喝下去才发现,满缸遍布着一寸来长的大蛆。后来听说,战友问起他的下落,有人肯定地说,史超已经牺牲了,那是基于史超浑身血淋淋的样子而做出的判断。史超说,刘伯承是随六纵队在另一个渡口过的汝河,他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淮海战役消灭黄维兵团之后,张际春交给史超一个任务,去采访一位起义的师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去见那位师长,巧了,正是汝河阻击他们的廖运周。这时才知道,廖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迫击炮总是打到距他们二三百米的地

方这个谜,也就不揭自破了。

史超在山区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刘邓首长指示,把文工团调回来,才从大别山回到军区总部,史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着刘邓首长打下郑州后,史超又成为军管会的一员,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后随军管会撤到禹县,在这里分了一处窗户上还没有糊纸的新房子。他把窗户纸严丝合缝地糊好,刚刚安顿下来,就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出发前,史超并不清楚这是要去打淮海战役。他随“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坐火车到商丘,这是史超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也没人提要打淮海战役。他们驻扎在离商丘二十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华东野战军派了一个百人慰问团来慰问“二野”,规模庞大。依惯例应该出面接见慰问团的刘邓首长却始终没有露面,其他首长也没有出面,史超被推到了台前,代表“二野”出面接待华东慰问团,刘伯承司令员把惟一的一辆吉普车交给史超使用。在为慰问团送行的宴会上,因为“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不能喝酒,史超那天向慰问团成员挨个敬酒,加上对方回敬,他喝了差不多二百杯白酒。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有多大酒量?”史老笑着说:“现在不行了,当年能喝几斤。”那天送慰问团上火车,他还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全是虚的——酒喝多了所致。史超说,后来才知道,刘邓首长正在夜以继日地准备淮海战役。

亲历淮海战役

决战前夕,史超随“总前委”行动,走了不少地方,“总前委”首长所在的指挥部最终安在一个叫小李庄的村子里。

据史超回忆,小李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当时,敌人的飞机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周围上空盘旋侦察,寻找“总前委”首长的指挥部。为隐蔽起见,马匹都关进屋子,更不能有汽车进出,电话线也不能高架,一律埋在地下。一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只通过电话部署一切、指挥作战。警卫人员给刘、陈、邓在村边挖了一个防空洞,约有六七米大小,不到一人高,中间特意留下一个土

台,是准备铺地图用的。但他们极少到这里来,参谋人员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不停地劝说,可是他们三人谁也不听,虽都拖着四川腔,但说法各异。刘伯承沉稳缓慢:“它(指飞机)打旋旋几百几千个圈圈了吧?原地踏步,不见缩小,可见它没有嗅到我们这几个猎物。”陈毅爽快:“我们命大,没得关系!”邓小平干脆用手一指:“你们要去自己去,不要管我们!”

史超所在的“二野”政治部,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距刘陈邓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庄不及一里路,这里倒没少遭敌机轰炸。当时“前指”各机构,都缩小到不能再小的规模。堂堂一个野战军的政治部,一共只有八个人,其中宣传部三人(部长陈斐琴、宣传科长史超、一名干事),保卫部三人,行政处二人。史超说,“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实际就管这八个人。

因为和“总前委”首长离得近,当年的很多情景还清晰地印在史超的记忆里。三位首长住在一栋茅草房里,大概是西屋,里外两间,里间有盘炕。刘伯承年长患眼疾,住在里屋,邓小平和陈毅住外屋。那时仗打得十分惨烈,战机千变万化,夜间三人中必须有一个值班,随时掌握情况,下达命令。刘伯承年纪最大,邓小平最年轻,为了保证刘伯承和陈毅的健康,44岁的邓小平自称年轻力壮,夜班主要由他来值。初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屋子里没有火,感觉就是一座冰窖,整夜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难熬之苦可想而知。打仗是不分昼夜的,从纵队来的请示电话,一宿少则七八个,多则数十个。邓小平为了不干扰刘伯承、陈毅的睡眠,叫电话班把耳机的线接得很长,有电话来,他就拿起耳机到院子里去接。

在接电话的间隙,靠什么打发时间呢?对于有阅读习惯的邓小平来说,书是最管用的东西。他有一次问起:“带来了什么书没有?”巧的是,在一切从简的原则下,史超竟然随身带了一本苏联小说《对马》。他马上拿给邓小平,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晚上,邓小平就把这本几十万字的小说看完了。不久徐州解放,这也是史超的家乡。他知道邓小平是留学法国的,一次到徐州搞印刷品,他首先直奔一家书店,把所有法国大作家的作品全部买下,有一大摞。恰好第三野战军接到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在缴获的吉普车中,挑一辆给刘司



史超在构思《大决战》

令员和邓政委，史超就搭乘这辆吉普车往回赶，没想到这是一辆走几步就“趴窝”的老爷车，史超只好找来一匹马，三天赶了几百里路，回到指挥部。当他把书搬到邓小平跟前时，本来看上去心情不错，正在院子里散步的邓小平却眉头微微一皱：“谁叫你们买的？”语气有几分不高兴。史超提醒说：“您值夜班……”“买那么多干什么？”这时，一个参谋经过这里，手里拿着庆祝歼灭黄维兵团胜利的标语，史超才恍然大悟，邓小平已经不用值夜班了。邓小平大概也看出了史超此时心里的委屈，蹲下身来，顺着书脊浏览了一遍书名，然后对史超说：“这还是很有用的，打完仗，干部、战士都要提高文化，丰富知识，送到后方图书馆去！”

整天钻在作战室了解战场上的变化、设下计谋、抓住战机、调整部队、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前指”首长，有时候也换换脑筋，在村前的一片桃林里散步聊天。史超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一天，地下党从上海送来采访的三位记者，在桃林遇见三位首长，机会难得，他们用国统区记者的语言和方式冲刘、陈、邓一连串地发问：“请问将军，消灭黄维兵团的时间还需要多久？比原先预计的容易还是困难？”“将军，请发表你们对目前战争形势的看法？”刘伯承听罢，不声不语缓步走开了。邓小平动了气：“我们

有什么可问的？到下面去，到部队去！战士在打仗，在流血！有许多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惊天动地，宣传他们，表扬他们，叫全军都知道，都学习！我们？我们有什么？”不容分说地一挥手，叫他们离开。陈毅则笑着跟上去反问：“你们是上海的学生子吧？”接着又问起上海人民的情绪、新闻界的动态、物价情况等

等……三位记者说得绘声绘色，从紧张的心理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时陈毅说：“你们住在哪个村里？会不会耽误吃晚饭？……邓政委的话，你们是不是真正懂了？记住了？你们仅从文字上知道战争两个字，战争到底是什么，你们并不理解，快些下到部队，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谈一谈，熟悉它……”邓小平在远处听见了，大声地嘱咐：“你们可以尽量深入采访，但不准到前线！”

创作《淮海战役》

三十七年之后的1985年，史超接受了系列影片《大决战》的创作任务，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淮海战役，已成定局。

接受任务之初，主创人员就怎么写林彪这个人物，去请示胡耀邦。延安时期，史超曾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胡耀邦一见史超，就朗声笑道：“好你个史超，我当初叫你不要搞艺术，你非要搞！”显然，胡耀邦很清楚史超的性格，大概也了解到，史超后来因为写了《五更寒》这部“大毒草”，没少受冲击，吃苦头。关于林彪，胡耀邦说，要如实写，要尊重历史。

《大决战》一共三部六集，从整体上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从1985年开始，一共

写了五年,九易其稿。其间,史超和其他创作人员遍访三大战役的战场遗址,看了一千多封电报,数千万字的资料,在怀柔宽沟的市政府招待所修改作品,一住就是几年。他还记得当时去军事科学院看电报,有规定只能看,不许抄录和拍照。但光拿眼看记不住,他们就想了个主意,把录音机揣在公文包里,边看边念。后来,军科的工作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了。当中很有一些是当年就注明“看后焚毁”却侥幸留了下来的绝密电报。

关于《大决战——淮海战役》这部电影,史超的看法是,从事实上说,基本准确;作为艺术品,与初衷尚有距离。他甚至认为,剧本第一稿的戏剧性更符合电影艺术的要求。对此,他举了两个至今还深感遗憾的例子。

粟裕在指挥“三野”全歼黄伯韬兵团后,向军委建议乘胜消灭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当时毛泽东支持粟裕的主张,而刘、陈、邓认为一下子吃不动。这时,蒋介石派一水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北上增援邱、李两部,如果“二野”堵不住黄维兵团,“三野”的部队有可能不仅打不垮邱、李两部,反而会遭到夹击,如此则后果不堪设想,淮海战役的结果必将改写。刘、陈、邓向军委连发两个电报,建议先打黄维,但没有得到回音。刘伯承随后布置了一个口袋,把黄维兵团装了进去,因为兵力不足,需要粟裕出兵支援,否则难免出现黄维兵团刺破这个口袋的可能。这时黄维兵团已经接近宿县,情势千钧一发,刘、陈、邓又向军委发出第三个电报。邓小平心情极其紧张,在等候军委的回电时,把自己关进屋里,盘腿坐在炕上,用扑克牌不断地玩儿“接七”,什么人来看他都一

(上接46页)小平本人始料所不及的。“邓片”和“陈片”都不提胡耀邦,不知道是否也和这篇讲话文本的改动有关系。我认为不提胡耀邦,不是什么“白璧微瑕”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历史,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在上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那篇讲话中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

言不发。此时,毛泽东的回电到了:不必请示,一切由刘、陈、邓决断。邓小平马上如释重负,把扑克牌扔到了一边。

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场面。史超把这个场面写进了剧本,后来也拍出了样片,但审片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被删掉了,观众没能在影片中看到这个生动、真实而不失戏剧性的场面。

另一个例子是“三野”所打的曹八集战役。曹八集是军事要地,谁先抢到了曹八集,就意味着抢到了战略制高点。原创剧本中有这样一个场面:粟裕在“三野”指挥部通过电话向纵队下达任务时,遭敌机轰炸,把总机炸坏了,接线员随后把电话线错接到攻占曹八集的阵地上,造成一个排长直接和“三野”首长通话的戏剧性场面。粟裕命令这个排攻占并坚守住曹八集阵地。战事相当惨烈,敌人也在不惜代价地和我军打对攻战,整个曹八集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这个排打到最后,没有剩下几个人,但他们最终守住了阵地。

史老说,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场面,但表现出来的战场气氛却一环扣一环,如此才能真实而突出地再现出曹八集战略地位的重要。令史超遗憾的是,这个创作场面连拍出样片的机会也没有得到,就被以“失真”为理由而“毙”掉了。观众后来看到的,是一些用敌我双方“赛跑”来表现“抢占”阵地的特写镜头,观众视觉上的“逼真”感大打折扣。

类似这样没能和观众见面但最初构思过、更贴近电影艺术的需要的情节,还有多处。史超至今认为,某些片段如果按剧本的第一稿去拍,观赏效果一定会强于观众后来看到的这部电影。

(责任编辑 萧 徐)

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

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咋就这么难?

加上苏兆征的镜头是实事求是。那么去掉谢富治的镜头,去掉胡耀邦的镜头,也是实事求是吗?当然,谢富治同苏兆征、胡耀邦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看来,真正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感谢沈容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资料。

沈容先生的《红色记忆》出版了。捧读这本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透过沈容先生的吴侬软语，一个个党史上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或可亲、或可憎、或可笑、或可鄙，像一幅幅白描，是那么真切，令我不忍释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有别于官方撰写的党史人物的好书。

书中有一小节名之为《邓小平审片》，据介绍，那天审的是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其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

看片时，我坐在他旁边，以备他询问和听取他的意见。这一类影片，按我过去在电影局的经验，是很难通过的。什么这个人的镜头多了，那个方面军的镜头少了等等，总要七改八改，改上几次，才通过的。所以，我有思想准备，认为一次审查总归通不过的。但是，出乎我意料，这次竟顺顺当当通过了。小平只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影片中没有苏兆征的镜头，应加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苏兆征是在广东最早搞农民运动的”。这件事我过去不知道。过去，人们谈农民运动只知道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从不提苏兆征。小平的另一个意见是去掉一个镜头，其中有谢富治。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读完此段，我想到了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这部片子我是从头至尾一集不拉的全看了，居然在反映改革开放的镜头中没有看到那两位关键人物的形象，胡耀邦仅仅露了半个脸，另一位连影子也找不着。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也有同样的问题。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怎样写进党史》（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一文中

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

史义军

说，“如果允许吹毛求疵，那么邓片的白璧微瑕是没有提到胡耀邦……”。

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一件事。前不久，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以三元钱买到了一本1981年8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印的《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论述》，在这本宣传材料的第44页上，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而是《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反映，说是‘砍旗’。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既然提得那么高，肯定十分重要，通过辩论，越辩论越看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十分重要。

这篇讲话，后来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为篇名，收入1982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在这几个版本里，上面那段话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一句被删掉了。“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改成了“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这一改，邓小平开始时是否过问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模糊不清了。按照改动后的文意，可以理解为邓小平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并且感到“兴趣”，予以“注意”。因此，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出以后，遭到责难时，就“进一步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

有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这些权威的版本，近些年来那些刻意否定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似乎就有了某种根据，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愿，把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功劳挂到邓小平名下，这大概是邓（下转45页）

节约型社会首要在于节官

● 章立凡

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策,主张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各新闻媒体忙不迭地征求节水节电节能源的各种节约点子,宣传声势之劲,颇极一时之盛。

认真学习国策之后,我也想出了一个节约点子——“节官”。

当今中国,冗员才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件大好事,但不应仅限于节约经济资源,理当标本兼治。将空调设定于摄氏27度,是可节约不少能源,但究属治标,治本之策,还须从节约社会成本做起。否则你辛辛苦苦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他那里大笔一挥圈地起楼——节约还是赶不上浪费。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精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毛泽东为此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

策》,发表于《解放日报》;又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中,再度肯定“精兵简政”。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被他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怨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总理周恩来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周恩来经济文选》——《要精简编制》)

对治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八万七千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视为洪水猛兽。其后五十年间,干部人数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如同顽固癌细胞,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党和政府家大业大,虽历经多次精简和邓小平时代的百万大裁军,“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毛泽东时代“党政不分”,干部常身兼党政两职。80年代倡导“党政分开”后,各级机构仍保持党政两套班子,形式上党的领导干部一般不兼行政职务,官位数量则比“党政不分”时代有增无减。中国共产党乃无产阶级之先锋队,不像

国民党拥有自置党产。上溯瑞金、延安供给制时代,自夺取天下到于今,中共党务干部为人民服务,薪给待遇历来由国库支出,不从党费开销。“党政分开”原系建设法制国家的应有之义,但纳税人同时负担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中国特色”。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摆出了一个数字——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据他披露:“1979年,我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当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人民公仆”,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达2000亿。除却大吃大喝、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国库损失,各种行政不作为、“拍脑门”决策和“政绩工程”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隐性资源浪费,更不知凡几!——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社会管理成本加重到民不堪命的程度,恐怕就不是稳定能够压倒一切了。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六十四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从国

民党腐败丢失江山,到中共转轨改革开放;从“苏东坡”一夜变天,到“颜色革命”骨牌效应……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干部有病,群众吃药”,不合节约原理;官数有节,官节有守,百姓自然“以吏为师”。“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

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屋 2005 年第 10 期目录

- | | | |
|-------------|-------------------------------------------------------------------|-------------------|
| 学界新论 | 文学改良新议 | 周泽雄 |
| 流年碎影 | 联大七年 | 何兆武 口述 文 静 文 |
| 边走边看 | 电子传媒时代的人类心灵
有多少“栏杆”?
——媒介形象与媒介策略札记 | 张兴成
赵 维 |
| 灯下随笔 | 我的“公民”观
说“贱民” | 冯务中
板儿爷 |
| 思史佚篇 | “偏”而后能“安”
——古都史话之六
透视太上皇现象
荐举之滥
——民国人事制度弊端之一 | 雷池月
鸣 弓
王春南 |
| 书林折枝 | 奥本海默的胜利和悲剧
制度转型视野中的民国初年
——读《袁氏当国》
老见异书眼犹明
卞太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 吴 生
严 泉
王成玉 |
| 域外传真 | 欣克利行刺案与美苏冷战结局
小拿破仑与雨果的流亡
——一篇读书札记 | 陈 伟
金铿然 |
| 空谷回声 | 诗人的呓语
再谈诗人朱湘及其身后事 | 张云江
眉 睫 |
| 来稿摘登 | 大学教育使人民贫困 | 赵钦宣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路443号《书屋》杂志社 邮编:410007
电 话:0731-5791300 5486759 传真:0731-5790197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 张颖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夏公和猫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奔南小街一条小胡同。那条小胡同在“文革”前我去过许多次,但这次却找了好半天,才寻找到那个小小四合院。门没有上栓,我一推就开了,小院洒满阳光,不远处有一张小桌一把藤椅,那都已经很旧了,夏衍同志坐在那张藤椅上。见有人进来,他有点惊异,两分钟,还没有辨别出是谁进来了,我快步走向前,他很想站起来,我已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双手,好一会儿他才回过味儿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走了吧!”我一劲儿点头,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滴下来:“夏公,我好想你啊,看您的脸色不错,就是太瘦了,还是吃的那么少吗?……”

暖暖静静的院子里,有两只狸花猫和夏公作伴,可能是母女俩,大的端坐在桌子上,小的却伏



夏衍 1930 年在上海

在夏公的肩头,不断的爬上爬下,夏公却悠然自得,有时用手抚摸一下。几乎所有和夏公较亲密的人,都会知道他爱猫,而且他总是把猫赋予人性。我们家也爱养猫,特别是住在平房的时候,可以镇住老鼠,如果不养猫那就等于养老鼠,但是我偏爱长得好看的波斯猫,雪白的,脸扁扁的,眼睛两色的。我曾对夏公说,您的猫不好看,狸花猫不美,我送您一只“白雪公主”好吗?他拒绝,认为波斯猫太娇气,而狸花猫既能捉老鼠又富人性,他最喜欢。说起夏公和猫,不少人都知道一

段非常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夏公被关进监狱,夏公家的老保姆和两只狸花猫仍然住在老房子里,她们想着夏公被抓走了,不过十天半月的总会回来吧,所以一直平静地等待着: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过去了,都毫无音讯。老保姆还有点积蓄,能维持她和猫的生活,她们相互慰藉,都在等待着相信夏公总会有一天会回来的。到了第六个年头,老保姆年老体衰,得病不治而亡故了。家中就剩下两只狸猫。原本在家里是有老保姆喂养的,老人一去不归,就断了粮。听说这两只猫虽然夜间常出外觅食,但不管是深夜或黎明,仍然会回到这个家来等待,哪怕是蜷伏在报纸堆里,都从未离开过,不管外边的世界怎样混乱折腾,这双猫始终未离开这个家。十年以后,夏



1963年夏衍(前排左三)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完成任务的新影、八一厂的摄影师

公终于回来了。从一个健康精干的中年人,变成一个残了一条腿的老人,拿着一根拐杖,艰难地回到这个家。这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到底曾经是家,他已经听说,老保姆已离开人世,但狸花猫呢。他无声地坐在院子里,某日他像是听到响声,却静悄悄的,老狸花猫慢慢地拖着极疲累的身子慢慢踱到老人脚下,用他曾是敏锐的鼻子嗅嗅主人的脚,好像是无助跃上主人的怀抱,而是在地下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第三天,这只猫伏在院子一角终于上他的天国去了。夏公无言,猫多么仗义多么忠心多么多情啊,难道这不是比人还人性么?

80年代夏公搬到六部口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四合院,有三间房也修缮得比较舒适,而老人住在后边小三间北房。他的居室不大,一张小床,旁边放一张茶几,不像桌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地方了。他从床上起来就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无论见客人谈话,还是吃饭还是写文章都在这么小方块地方,有时吃饭也走到那间较大的房间,那既是客厅又是饭厅的地方。他搬家以后我和凤子第一次到他的新家时,一进大门感觉不错,顶宽敞的。木柱子还涂了红漆,小院子里还栽了几棵翠竹,从小房向外望去,能看到翠竹随风摇曳的影子。我们一进房间首先看到的又是两只狸花猫,还是一老一少,那只老的正面对夏公端坐在小小的书架上,而那小的就是伏在夏公的肩头,那还是南小街小院的景致吗?有一次正好夏公吃午饭,那

只老猫坐饭桌上,正陪着夏公用餐哩。老猫静静地端坐桌上,小猫则在地上咪咪叫。我和凤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视而会心微笑,夏公和猫是分不开的一家子,正如夏公所说,猫是通人性的。

初识夏公,初读夏公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

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的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座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当时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才正式见了面。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的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青嘛,你二十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二十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以后夏衍常常来曾家岩50号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

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也是从前辈的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们,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写文章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只有他的话剧创作我读的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到《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夏衍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历史剧中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时期的郭沫若和田汉等人不同: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鞑,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

对夏公的一次不公正的批判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已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我又在文化组工作。忽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当时我有点吃惊,我据实回答说,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

事。夏公有点茫然地说,延安派来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面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一面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默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不仅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并着重介绍延安近年所获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来的几位,虽然没有演员,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来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因为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而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色,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颇大波动。其实1943年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曾说过,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各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当时像在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的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是在讨论并检讨国统区文艺工作期间,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上演了,同时茅盾第一个话剧《清明前后》也演出了,立即引起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特别关注,认为作为文艺界领导夏衍的《芳草天涯》的演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新华日报》展开了讨论和批判。

最近我重新翻阅了1945年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那次对夏衍《芳草天涯》的批评是有点与过去不一样,即不是单独批评一个话剧,而是开了座谈会,讨论《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座谈会是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11月28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纪要,而发言人却不用真名姓都以英文字母代替,现在读来我都感到很奇怪。我在重庆工作期间,《新华日报》用这种方式来登座谈会记录很少有,因为这样的

座谈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这篇座谈记录的内容无疑是拿这两个话剧作对比：一是正确的，好的；另一个则是坏的，错误的。对于《清明前后》无须再说，那是一部在当时有影响的好戏。那么《芳草天涯》是否就是坏戏呢？当时在《新华日报》上的批评是这样说的：“……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他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他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能弹久矣，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的说，一切生活都离不开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为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认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愿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明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引自《新华日报》）同时对《芳草天涯》剧本亦是有批评的，涉及到恋爱婚姻观点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非政治”主题思想，没有切中时弊。从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内容来看，对剧本的批评倒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从《芳草天涯》的演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活动，甚至整个文艺工作有“非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在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幌子下，实质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一个剧本的演出，两个剧本的对比来看，得出了如此重大问题的结论，而且针对着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人，有影响的党员夏衍作为典型例子，应该说不是小事情。夏衍几十年来都对这次批判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对于谁来说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约有六七年之久，在我的记忆中，重庆文艺界并没有

对文艺工作涉及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讨论或争论，只是在延安整风时，重庆曾经学习过“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等理论，因为在重庆进步文艺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倒退反民主，极少可能提出“反教条主义、公式化”的问题。倒是非政治倾向的问题有过讨论，因为在国民党严格统治下，演出了不少历史题材或民国初年的题材的话剧。而这些话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或者能以古喻今。而这些话剧能否也称为非政治倾向呢？我想夏衍一剧《芳草天涯》是构不成一种倾向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涉及到整个蒋管区的文艺活动的方针路线问题，所以夏衍非常关注周恩来在延安对于这次批判《芳草天涯》的态度，这是值得深思的。

最近我重读了《芳草天涯》剧本以及夏衍的其他一些剧本，除了《芳草天涯》我没有看过演出，其他的如《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等等，只要是在重庆上演过的，我都看过。这些剧本的主要人物是小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在此文中我不想探讨夏衍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和风格，只就这些作品的内容来说，无疑都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思想性和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而且创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我认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有一定地位的。那么夏衍写了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当然也不能构成他本人话剧创作的政治倾向。人们都会这么认为：恋爱或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人生总离不开爱情，有愿意在爱情上划分阶级性也无可非议。夏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领导文艺工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呢？无疑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思想来写？如何写？批判者认为：《芳草天涯》没有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婚姻恋爱在人生中的意义被夸大了，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的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何其芳评《芳草天涯》的文章。（原载《关于现实主义》，1959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又重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更难理解这样的批判。

夏公这个剧本的大背景是抗战期间，两个主人公之一孟小云（女大学生，积极的抗日进步青

年)、男主人公尚志恢(有爱国思想的并不积极进步的大学教授)两人相遇,接触一段时间后,两人心中都萌生了仰慕之情。尚志恢有妻子但思想落后,感情不好,看到孟小云年青美丽又有朝气,就产生爱慕。孟小云有男朋友是大学同学,认识尚志恢后感到他成熟、有学问,由敬重而产生爱慕,但仅此而已,只是在内心和思想上有爱恋之情,并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越轨。以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感情不对而受到心灵上的自责。于是孟小云去了抗日前线,尚志恢则在道德观上认识自己的错误,把个人追求幸福建立在使别人痛苦之上是不道德的,最终与妻子和好。这段“精神恋爱”就如此结束了。



在电影剧本《革命家庭》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剧作奖时夏衍(左)与水华合影

批判者认为夏衍这种婚姻观,不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这种婚姻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是一种高尚道德观的体现。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道德观仍然是高尚的、可取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要如此高调进行批判呢?由于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重庆,那时形势已经大变了。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虽然夏公问我多次,我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很不应该地马虎过去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逐渐想起夏公对此事多么重视,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事隔数十年是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但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当年那样批判夏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左思想作怪,还可能掺杂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

从30年代开始,进步的或左翼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斗争,而同时在左翼内部也在进行各种多样的宗派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斗争持续不断,有思想上的分歧,有地区不同,各种小集团或多个人物之间都纠缠着明争暗斗,而无休止。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跳了出来把所有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和作品都一锅煮了,名之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无论作品或人物都成了黑线,又粗又长的黑线,一概抹煞。江青要自创一套所谓革命的红色文艺。这十年就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届文

代会召开,当年进步的文艺才又活了过来,有了不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界各方人物又活跃起来,然而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或宗派斗争的阴魂却未散尽。有时是以各种不同样式表现出来,或者变成压倒别人、争名夺利而演出一些丑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为文艺界,为夏公,我不知深浅见部长

从30年中期以后,周扬始终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也是文艺界人士所公认,晚年却遭到毫无道理的非难,可以说含冤而去。但逝者已矣,自有后人评议。周扬病后,领导文艺界的不少事情自然会落到夏衍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夏衍是全国文联党组领导,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也不过是开会时听听汇报,发表点意见而已。我了解夏衍的性格和为人,数十年来他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友善。从不摆什么架子,所以他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探望的,聊天的,拿作品去请教的都有。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比较多。每次到他家都有客,倘若我要与他谈公事,则要约好时间免得费时等待。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看望他,除了对他说了不少美国情况,并告诉他我预备退休了。他抬头望着我说:我比你大多少,我还没有退呢。文联和外交部不一样,没有一刀切的问题,你过几天就来上班,正需要人做事哩。他让我再坐下有点黯然地



1994年10月30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举行仪式,庆祝夏衍同志95岁寿辰和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

说,周扬病后,文联的事很不好办,思想不一致,我也当不惯这个领导。我看夏公那瘦削的脸庞,忧伤的眼神,心中不忍,我告诉他过几天就去文联上班。

我在美国时就听文艺界朋友谈到过国内的情况,文艺界的领导实质上是两套马车,夏衍是文联领导,而中宣部、文化部则是贺部长领导,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常常不一致,实际上是贺部长领导文艺界。我见过夏公以后考虑:应该把两套车合起来会跑的更快更稳吧。文革期间我与贺部长夫妇称的上是“铁哥们儿”,无话不谈,有事也无不商量的。固然也曾听朋友说过,贺部长是当官了,人是会变的,我心中却不以为然,会怎么变呢?同志朋友总是不变的吧。有一周末我抱着会见故友的愉快心情跑到南沙沟的部长宿舍楼,以前我已来过多次了,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即叩开门。贺部长看见是我,也没有特别异样,把我请到客厅,送上一杯清茶,我们很随便地闲谈起来。我先对他谈到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又告诉他去看过夏衍,这时他才怪怪地看我一眼,当时我并没有敏感到什么,还按着我的思路谈。我说夏衍是个老同志,是位长者,为人谦虚宽厚。他皱了皱眉。我接着说,听说你和夏公相处的不太好,我又说:“你们也许有些意见分歧,不会是在大问题上吧,你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一下呢?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去看望他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话音

未落,这时夫人从旁门窜了出来。其实我们原是莫逆之交,见她如此把我吓了一跳。未等我回过劲来,她却用手指着我大声说:“你别得意太早了。现在他们用的着你,把你哄着捧着,用不着你时,你的下场就和老贺一样……”我大为吃惊问道:“老贺怎样啦!他现在还当着两个部长哩,谈不到什么下场吧!”她说:姓夏的不就是想当祖师爷吗?你看看,无论什么人到了北京都要去拜见他,把剧本啦、电影

啦、作品啦都往那里送。为什么不往这里送呀!……当时我真是目瞪口呆。说这是怎么啦?本来夏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有实际经验,朋友们或年青人去找他是很正常的,怎么就扯到祖师爷呢?当时我看着他两人的脸色不好,我不知所措,几分钟后就告辞出来。由于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久久抹不去,于是写了下来,但愿从此忘掉。

在夏公指导下拍摄《周恩来与文艺》

1990年,我正式退休了,完全无需每天坐班的感觉真好。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很自由,不受任何干扰,那时我很想整理总结一下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有机会向夏公说一说这个想法。一天我收到朋友从瑞士寄来的巧克力糖,这是夏公爱吃的,我带着糖轻松地探望夏公,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身体尚健朗。他看见有人去探望总是很高兴的。我告诉他巧克力刚收到,想到您爱吃就来了。您每顿饭都吃的那么少,又很劳累,会吃不消的。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因为他的视力已很不好,要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东西,但他仍然是每日看不停。他抬头见是我送去糖,很高兴。打开盒就放一块进嘴里。他很高兴地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他已知道文联各协会领导班子全都换了。我愉快地说,这下好了,

可以彻底解放了。他问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即告诉他,我首先想做的是总结一下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我并告诉他我想最好是拍个电视专题片,那样还可以留下许多文艺界朋友的事迹,但我怕自己力所不及。夏公一听,立刻高兴起来说,太对了,对你说来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你才可能组织这件事。本来我早想过,你应该做这件事。我当时感觉惭愧说,我想是想,但怕不行,有许多困难啊。夏公鼓励我,你行,但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同志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开头的,你全力来做肯定行。夏公就开始计划了。他说:你首先找荒煤、光年两人,请教他们,要他们带头来做。但具体事情都得你去组织去执行。我真没有想到,他随手拿起电话即打给光年同志,告诉他这事太好了,大家应该做。现在张颖要做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有精力有组织经验又了解全面情况,你出主意就行了。接着,他又给荒煤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当时既感动又很受鼓舞。立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好。

我找到光年和荒煤,他们也和夏公同样热心,立即出主意要先组织个筹备组,除了他两位加上周巍峙和冯牧就成了。并定了一周以后即开始行动,到我家聚齐,真没想到行动如此迅速。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了具体方案:首先要办的事,一是写出内容提纲,二是考虑筹措赞助款。因为拍电视专题片有人还要有钱,当时分配给我的首要任务是写提纲,筹赞助则需找广东上海等地的文艺界朋友大家想办法。我们五个人中,光年、荒煤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巍峙还在一线工作,冯牧说他情况了解不全面,七十岁的我算年青力壮。跑腿等事都由我来担当,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十天左右我草拟了提纲,还没有给荒煤他们看过,即到夏公处。那天我去他家倒是没有客人,只见他拿着放大镜在看别人送来请他看的稿子,非常专注。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翻书的情景,使我很感动又有点心酸,老人已身残体弱还是那样不知疲劳地工作、奉献。我轻轻走过去告诉夏公,我已把提纲草拟打印出来,还没有讨论修改,先送过来给他过目。随即我又说,您的视力太差就不用看了,我给您说说吧,他点点头。我说了个大

纲,他说你把稿子放下,我抽空要看的,先给你提个醒:这部专题不仅是反映恩来同志一个人,而是要反映出当年整个文艺界的情况和人物,又从这些人物表现整个进步文艺界的精神风貌。他又说现在文艺界的老人还有不少健在,都应该去逐一采访,留下宝贵的资料。他兴奋地谈着,我即记下来,并把采访的名单也写下了,居然还有数十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他提议我出去跑一遍再回来仔细研究。赞助费他又提出由广东、上海去筹募,又提醒必须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并求教,否则办不成。他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宝贵,非常周到,又切实可行。随后我和光年、荒煤等同志商量后,即外出去上海等地。

这部片子运作了近三年,在这两年中夏公的身体日见衰弱,我每次从外地回京都去看望他,但一次比一次更清瘦,更衰弱,终于住进了北京医院。几次要电视采访他,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都没有如愿。到1992年他离开了人世,而我们的专题片没能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周恩来与文艺》十集共五小时拍摄完成时,他已看不到了,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

了解 20 世纪中国 勿忘订阅《世纪》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 邮发代号 4—557

2006 年《世纪》订价 39 元



《世纪》凭借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文史人才荟萃的优势,以第一手资料披露近百年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可读性强,深受知识界人士,尤其是文史专业人士和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喜爱。

《世纪》采用国际标准大 16 开 80 面,逢单月出版,2006 年单价 6.5 元,全年 6 期,订价 39 元。敬请您到当地邮局订阅。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不另收邮费)。另有 1995—1998 年(4 册),2000 年合订本,每册 30 元;2003 年每册 35 元(挂号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上海市(市南)思南路 41 号《世纪》杂志社
邮编:200020 电话:(021)54657202 64675768

塞克的人品与文品

● 孙焕英

塞克(1906——1988),原名陈秉钧,河北霸县人。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他是剧作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他是表演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表演艺术“体验派”的代表人物;他是诗人,和冼星海、王洛宾、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合作的《救国军歌》等歌曲,在抗战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他还是画家、翻译家。他曾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

人品 特立独行

谈到塞克的人品,首先要看到他的政治信仰。塞克受“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影响,一生曾经参加过许多文艺社团,却一直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是,这并不是说塞克没有政治信仰。按照一个习惯用语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塞克”,就是俄语“布尔塞维克”音译的简化,现在音译为“布尔什维克”。塞克是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古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塞克信仰马列主义,三入牢门而不悔。他早在哈尔滨做《晨光报》副刊主编的时候——那时他叫陈凝秋,就因为发表共产党人的和支持北伐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因为他,报社也被查封。后来,他偷越国境跑到了苏联,想到那里寻求列宁主义,结果,又被怀疑为“国际间谍”而第二次被捕关进了外国人的监狱。再后来,他在上海组织并参加了“大地剧社”,到南京演出进步戏剧。回到上海以后,还没有出火车站,第三次被捕又被关进了监狱。这样一个坚定的进步人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塞克先生和我说笑话,解释“反动学术权威”六个字,他说:“我一是不学无术,

二是无权无威,三是一辈子反对反动!”

说到塞克的人品,他是当年延安的一大怪。“延安四大怪”,塞克是“天怪”,第一怪,最怪。在我看来,塞克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怪”,是因为他具有独立人格、坚持独立思考、实践特立独行。

举一个例子:在“文革”中,1967年还是1968年,记不清了,10月10日的晚上,塞克先生、我和钱韵玲女士就是冼星海夫人三个人在塞克的书房里喝茶聊天,谈到了冼星海。塞克和冼星海,曾经有过三度合作,一度是在冼星海去法国之前,一度是在冼星海从法国回来之后,第三度合作是在延安时期。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冼星海死后,塞克流着眼泪写下了星海挽歌,我都见过原件。可是,在冼星海从延安赴苏联的时候,塞克居然拒绝参加冼星海赴苏联的欢送会——这当然使人很难理解。人们在欢送会上热烈祝贺冼星海将赴苏联,而塞克则在山上痛苦地来回走着。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塞克看来,冼星海去苏联,是错误的。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在祖国最需要冼星海的时刻,冼星海不应该离开祖国。冼星海所以同意去苏联,是受了王明的影响,冼星海是崇拜王明的。塞克的看法是否准确和符合实际,我们姑且不论。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塞克是个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一个他和毛泽东的例子。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还是非常谦虚的,礼贤下士。塞克刚到了延安,毛泽东立刻就到了招待所看望塞克。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他想到了塞克。因为,塞克敢于说真话。毛泽东派了李卓然去请塞克。岂料,塞克拒绝了!李卓然询问原因,塞克说,毛泽东那

里岗哨层层，他不愿意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走动。没办法，李卓然只好回去，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自然，这个决定，遭到了毛泽东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结果，还是在塞克来的时候撤掉了岗哨。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塞克的人品，不搞阿谀奉承，不邀宠上爬，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自尊。

文品：文如其人

塞克的文品之属性，首先是其作品的政治倾向，这就是民族的尊严。这和他人格上的自尊是一致的。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第一原则，就是政治倾向。他说：“凡是普遍流传的歌曲，都是因为歌曲的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生命，以及强烈的时代色彩，它的流传正是那政治生命在群众之中的生长。”塞克一生创作的亮点和高峰，是抗日战争时期。像《流民三千万》、《救国军歌》（冼星海曲）、《心头恨》（贺绿汀、冼星海曲）、《全面抗战》（贺绿汀曲）、《谁敢夺我一寸土地》（贺绿汀曲）、《保卫卢沟桥》（冼星海曲）、《抗敌先锋队》（王洛宾曲）、《血花曲》（王洛宾曲）、《老乡，上战场》（王洛宾曲）以及《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曲）等等有名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它们的政治倾向或者说是主题思想，无一不是“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即民族自尊和反抗侵略。这是时代的精神，又是永恒的主题，加上一流作曲家的合作，所以，塞克的这些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着不灭的生命力。

塞克的文品之另一属性，是在艺术上的民族和大众性格。实际上，这是塞克民族尊严的政治倾向的折射。一个艺术家，心里想着民族和大众，他在创作的艺术上，必然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民族性和大众性。以歌词为例，我们纵观塞克的作品，其艺术上，有一个从《诗经·风》到汉《乐府》的传统，那就是平实、上口、简练、通俗。像《二月里来》：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再看：

“种子下地会发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心头恨》）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二月里来》）

这些非常生动形象富于文学韵味的诗句，实际上都是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创新而来。

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当中，曾经这样说：

“我们应当多注意和多学习在民间根深蒂固的一些成语（作者注：此处“成语”指老百姓现成的常用的口头语言，不是指“典故成语”之“成语”），把这些成语拿来，赋予新的生命，加以组织，它自然会成为一支最新鲜、最有意义、最富于普遍性的好歌。”

这篇文章中还说：

“我们要特别顾到语言习惯，作者要是违背它，人家就会听不懂，听不懂就等于宣判了这支歌曲的死刑。”

当前，有些歌词，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如入五里雾中。实际上，这些歌曲的演唱者及其歌迷，自己也是不知所云，不过是在那里不懂装懂、故作时髦罢了。别看这些歌曲在一些歌手及其歌迷当中那么红火，实际上，它们没有几天的活头。（责任编辑 吴思）

说明

本刊2001年第6期刊登的《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一文中说：“1922年10月，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的刘少奇”。读者卢求真同志提出：当时窿外主任是陆沉（陆是卢的父亲），要求本刊更正。

经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传》说：“1922年冬，刘少奇为窿外主任”。（该书5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编印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中说：陆沉“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该书212页）据分析，刘、陆可能在不同时间任过此职。

根据卢求真同志的多次要求，对此情况作一说明。

本刊编辑部

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 于继增

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黎明时分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定局。但是，蒋介石为负隅顽抗，玩起“引退”的花招，悄然回到了浙江奉化的老家溪口。但谁都知道，他仍是大权在握。他依靠听命的亲信，随身的电台，密切关注着战局并发号施令。

1949年4月18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新华社4月18日电 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这份电讯使蒋介石立刻脸色苍白，骂了一句“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随即头晕目眩，往后便倒。俞济时抢先抱住，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乱作一团……

团长欣然接受策反

蒋介石为什么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会如此沮丧和大动肝火呢？这与他对该团的器重和期望值很有关系。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

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我军作战。但在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赏识，视为掌上明珠。1945年9月9日，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曾专门调遣训练有素的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可见三团的特殊地位。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3团团长刘农峻交底：到台湾后，将3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然而第3团团长刘农峻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出生于湖南绍东，早年曾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通讯学校十一期。三十二年又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一期，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刘农峻陆大毕业后分配到战斗部队，当上了陆军上校团长。当此大厦将倾之际，何去何从，他在苦苦思索。他曾在办公室亲笔写下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难欺。”可以看出,他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指挥官是有些不同的。

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掌握了蒋介石策划伞兵团南下出逃的意图,也了解3团团团长刘农峻的经历,决定把他作为策反对象开展工作。事不宜迟,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立即派李正文与段伯宇取得了联系。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峻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峻。

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峻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峻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峻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3团的同时,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蒋介石在哀叹之余,抓紧制定应变计划——在坚守长江南岸防线的同时,将嫡系精锐部队撤往台湾,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为此,责成国防部命令伞兵司令部:“着伞兵部队分作三个梯队,分别于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团顺序,从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误。”

这个命令意味着蒋介石逃跑计划的实施。刘

农峻立即将此情况通过周其昌转告了我地下党。

接到情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的伞兵团晚些时候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起义的方案,让伞兵3团在调防途中起义。同时,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决定把对策反伞兵3团的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归上海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这几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关系。

此时,南撤计划又有了新变化。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接到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刘农峻心中一惊。因为目前官兵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另外与2团合编梯队行动多有不便。他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

这时候的上海滩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军警宪正一齐出动,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搜捕。此时的张执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转移去了苏北根据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伞兵3团起义一事则移交田云樵负责。他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还要确保3团单独调防,这样才能保证起义万无一失。于是通过内线来干扰和推迟南撤的行动计划。

三天后,伞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报告:“伞兵3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3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此时的段仲宇,已调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专管海陆运输船只调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3团1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3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1、2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

这正是大家所企盼的。刘农峻接到3团推迟

南撤的命令后,内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烦,便急切要求会见新的联络员舒忻,商讨起义具体事宜。

4月7日,舒忻受张登、田云樵之命,在浦东三林塘3刘农峻大,恐难成功。因为江南是国民党的天下,难逃海上空军的追击,伞兵不习海战,必致船毁人亡……”

“为什么一定要在江南起义呢?我们的看法,可以在江北起义!”舒忻知道,刘农峻作为一名上校团长,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他在军事上的考虑也有道理,于是耐心地说:“长江以北,除青岛外,沿海的山东、江苏地区都已全部解放;兵舰出长江口后,可先向南驶,以蒙蔽敌舰监视,待夜里再悄悄折向北方,直驰连云港。若遇紧急情况,可在苏北沿海随时靠岸。”

刘农峻听了这番话,对局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解除了顾虑,同意了在驰往连云港途中起义的意见。

4月9日上午,田云樵、舒忻、陈家懋、刘农峻等人乔装打扮,陆续来到上海“大沪饭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楼雅座,对起义具体事项一一研究。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峻、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3团起义指挥部”,刘农峻任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党支部,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武装纠察队,密切监督和处理突发情况。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云樵,在碰头会上郑重宣布:“起义途中,情况变幻莫测,要及时正确应变。对于胆敢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决不留情。”

4月10日,刘农峻在三林塘团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奉调南去福州,13日离开浦东,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与3团同行。他责成陈家懋和李贵田负责联系船只,安排、组织人员物资上船。

神秘的“国防部急电”

经过紧张的工作和细致的准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9年4月13日上午,伞兵3团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共2500余名官兵在黄浦码头聚餐。

团长刘农峻举杯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同时宣布:为了航行的安全,任命团附(国民党军阶之一,相当于“团长助理”——笔者注)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

伞兵3团团附、地下党员李贵田当即宣布登船事项,从各连指名抽调班长、士兵组成纠察队,由周其昌、孟虎(均为中共党员)担任正副队长,负责航行期间的安全工作。

下午2时,刘农峻团长一声令下,宣布起航。由段仲宇安排的上海招商局的“中102号”坦克登陆艇一声长鸣,缓缓驶离上海黄浦港。艰难的航程开始了。

下午4时,准时通过吴淞口,加入东海航线,一直向南驶去。

晚上7时30分,登陆艇来到东海花鸟岛以东的海面上。

李贵田密切注视着航海标记。按领航规定,这里是南下和北上的转折点。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他来到登陆艇驾驶舱,登上驾驶台。毫不知情的艇长不满地说:“这里是驾驶重地,你来干什么?”

“传达国防部命令:‘因战事需要,命令伞兵3团增援青岛。’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掉头北上。”李贵田沉着地边说边拿出事先拟好的“国防部急电”。

“不可能!我的上级命令我艇运送你们去福州,你想改变航向,需要请示我的上级。”艇长傲慢地说。

“军事行动,瞬息万变,你运载我们团,就得听我们指挥。你敢不服从国防部命令?耽误了军机大事,军法论罪!”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纠察队带领爱国华侨海员白力行、国民党原重庆号巡洋舰轮机长武成绩进入驾驶室,他们与这位艇长熟悉,告诉他军人不可以抵抗命令,还是改变航向吧。艇长看了看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只好下达转舵北上的口令。

与此同时,3团无线电台台长成书生和纠察队也进入登陆艇电讯室,控制了报务员,拔掉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切断了与国防部的无线联系。尔后,他又急匆匆来到设在艇上的团部,送给

总指挥刘农峻一份“国防部特急电报”。

刘农峻看过电文，吩咐中尉通信员周其昌：“立即通知营以上军官，速来团部开会，传达紧急命令。”

几分钟后，军官们鱼贯而入。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副团长姜健，嘴里骂骂咧咧。

“国防部命令，”刘农峻率先起立，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命令伞兵三团暂停南下福州，即刻北援青岛我军，不得有误。”

“不可能！伞兵司令部和一、二团已经在前几天到了福州，又去了台湾，怎能叫三团去增援青岛？”副团长姜健首先发难，他拍着桌子叫周其昌把台长找来。

无线台长成书生是周其昌、孟虎发展的积极分子，早就表示不去台湾，并且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当他来到团部后，面对姜健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什么抄报时间、译报时间、频率、呼号等，都对答如流。

姜健没问出什么破绽，突然命令成书生：“发报请示国防部，核对北上靠岸的地点和任务。”

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农峻扫了一眼姜健，果断地说：“我是团长，我向国防部负责。不要再向国防部请示了，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各位回去，切实掌握好部队，不要听信谣言！”

登陆艇满载着蒙在鼓里的 2500 多名官兵，驰向青岛方向的茫茫大海。

惊心动魄的海上举义

4月14日下午4时，登陆艇来到苏北射阳县的东北海面。由此处向西拐，便可进入去连云港的航道了。

连云港是位于上海和青岛之间沿海的重要军港。此时的上海及青岛还依然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连云港已经宣布解放——1948年11月7日，徐海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9绥靖区部队，在我军猛烈炮火下从连云港仓皇撤退。所以这一带是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安全地带。

指挥部决定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起义。

刘农峻后来撰写的《伞兵三团海上举义记》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刘农峻见军官们到齐了，说道：“今天我团以孤军增援青岛，无疑是以卵投石，不是当炮灰，便是当俘虏，总之是有去无回。”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全团官兵，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不少兄弟已组织起来，提出不去青岛打仗，起义投共，因事关重大，特地把各位请来商议。”

军官们听了，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共产党搞的鬼，老子和他拼了！”八连长一声嚎叫，猛地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指扣住导火索，恶狠狠地说：“谁是共产党，有种的站出来！”

“胡闹！”刘农峻一拍桌子，“甲板上堆满汽油弹药，船舱里都是家小，你想让大家都完蛋？把他带下去，给我禁闭起来！”早有准备的纠察队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将八连长制服，架了出去。

这当头一棒，把满腹狐疑的副团长姜健等人镇住了。

“陈主任，听听你的高见。”刘农峻有意让也是地下党员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带个好头。

“欲进无路，欲退无门……”陈家懋沉吟着说：“如今只有起义这条路了。”

“副团长，你的意见呢？”

姜健内心里反对起义，但又不敢明言，怕跟在船上的妻儿受牵连，真是左右为难。便对团附李贵田说：“请团附先发表意见。”

李贵田顺势说：“团长以全团兄弟的身家性命考虑，提出走起义之路，兄弟我愿意服从。”

其他三个营长和连长们跟着表态，愿跟随团长起义。姜健见大势已去，只好说：“事到如今，就听团长决定吧，我一家七口都在船上，还请团长多关照啊。”

“周其昌先生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刘农峻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周先生讲话。”

周其昌从南京、上海已被解放军包围，全国快要解放，讲到共产党、解放军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当兵的都是一级听一级。营连长们一见顶头上司一个个都想弃暗投明，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纷纷表示愿跟长官效劳。

刘农峻见大家表了态，便说：“我宣布，伞兵

三团从现在起脱离蒋帮,即刻起义。请各位立即向全团兄弟传达这一命令,不服从的,立即关押起来。”

此时的艇长已完全被我控制,在全副武装的纠察队面前,只得乖乖听命。

登刘农峻于这次起义,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后来只在解密的《国府军事档案》之“伞兵第三团投共始末”约略写道:“(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伞兵第三团奉命由上海转运移防福州。共军得知后,遂命潜伏于第三团通信连之共产党员周其昌中尉策动团长刘农峻上校叛变。”“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刘农峻见大局不利,于是趁海运南下时,与团附李贵田,胁迫第三团搭乘之海军中字号—0二坦克登陆艇北运连云港投共。”

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

1949年4月15日,黎明时分,“中102号”坦克登陆艇徐徐驶进连云港。

由于事先接到中央军委来电,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伞兵三团2500多名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接受检阅。团长刘农峻、副团长姜健、团附李贵田,以及3团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组织委员陈家懋等站在最前面,谷牧、王晓等领导走上前去,与这些从特殊战线归来的英雄们紧紧握手,说:“各位官兵,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

4月18日,新海连特委和连云港

军民为起义伞兵召开庆祝大会,特委书记谷牧致欢迎词。起义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当日,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新华社通讯社及时播发了这条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另外,中央军委在给特委的复电中明确交待:“伞兵起义后,服装不变,待遇不变,军饷照发。并做好培训工作。”

新海连特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抽调一批地方及部队得力干部,分两批集中培训起义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对士兵则采取到驻地讲课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绝大多数起义官兵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决心跟共产党走下去。

1949年11月21日,这支起义部队奉命调离连云港,改编成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伞兵训练总队,刘农峻担任总队长。后又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第一师,刘农峻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务,其他率领起义的同志也分别担任要职。只有上校姜健后来称病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改编后的伞兵3团的广大官兵,成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2004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2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第10期陈虹的文章第9页两处引文有误。一是说叶剑英为罗瑞卿填了一阙词,表示惋惜。这是作者臆想,而且所引词第三句是错的。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作者把辛词误为叶填,而第三句把“万里”改为“望”更加不通。原词是讲李陵和苏武分别,故有“向河梁(指桥),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之句。另,引刘禹锡的诗,可能错写了一个字,使意思难解。第一句原为:“百亩庭中半是苔”,作者写成了“半自苔”。第二句则有此一说,不同的版本还有“桃花开过菜花开”。任可

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

● 阎稚新



1979年薄一波(左)与阎稚新谈山西新军问题

1936年8月,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11月3日,薄一波抵达太原。翌日薄同阎锡山会面谈判,阎同意薄一波等接办和改组牺盟总会领导机构,27名新委员中,21名是秘密共产党员,7名常委中有6名共产党员,从而掌握了牺盟会的领导权。薄等还开办了拥有2万5千名学员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创

建山西新军作了干部准备。

有一次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假如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薄一波说,仅依靠旧军抗战不行了,建议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薄,先搞一个团试试看。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10月,大同失守,太原告急,阎锡山把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阎接受薄一波建议,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薄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只一年多时间,决死队发

展到4个纵队,1个工卫旅,3个政卫旅,及战动总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由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正式番号的,共9个师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之众。山西省7个行政区中,有6个为我党所掌握。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

众所周知,山西新军决死队,战果辉煌,在八年抗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5万

余人。山西新军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将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诬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叛徒领导的杂牌军”。1978年12月,薄一波向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尽快澄清,予以平反。小平同志看了报告,亲笔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

定。”总政治部 1952 年 2 月 5 日在复西北军区政治部的公函中说：“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从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

山西新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具有特殊权力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由薄一波拟订、经阎锡山批准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对新军一切工作拥有最后决定权。政治委员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从而确立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关于山西新军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驳斥蒋介石宣布决死队为“叛逆”时说：“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

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由此可见，蒋介石是把新军当成“共军”、“叛逆”讨伐消灭的。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历来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同等看待，视为“共产党的党军”。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报告中说：“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也讲过党军，但是指党的领导。”

1937 年 9 月，一支决死队由薄一波率领开赴晋北抗日前线。朱德总司令面告薄一波：今后决死队即归总部指挥，在八路军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薄一波至今还戴着“山西帽子”，说“山西话”。朱总和彭德怀明确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合作。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做共产党的事。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朱总、彭总明确宣布：决死 1 纵队归总部领导指

挥，分处各地的新军由中共各区党委领导指挥。山西四大区党委都设军事部，专门负责领导新军的工作。

1979 年 12 月 7 日，经党中央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明文规定：“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并据此解决了“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问题”。至此拥有 300 万会员的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得到公认，拥有 7 万人枪的决死队党军性质得到确定。这是党中央关于牺盟会、决死队冤假错案的平反决定，也是党中央关于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是“由我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党领导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性质的政治结论。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赵友慈）

<p>欢迎 订阅 邮发代号 25-42</p>	<p>2006 安徽老年报</p>	<p>四开四版 每旬二期 逢五逢十出版 全年订价 21.60 元</p>
<p>▲ 一版 新闻言论 ▲ 二版 卫生保健 ▲ 三版 《枫林》副刊 ▲ 四版 文摘 ▲ 月末为综合版</p>	<p>本报是我省唯一的老年人报纸，曾被省评为一级报纸、编校质量先进单位、广告发布诚信单位。</p> <p>报小信息多 文短品位高 惠而不费</p> <p>《安徽老年报》，老人都需要，增加知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欢迎老年人订阅，也欢迎给亲友赠订。</p> <p>《安徽老年报》，中青年人也需要，继承传统美德，学会尊老敬老，欢迎为自己长辈赠订，献上一份孝心。</p>	

刘奠基·晋察冀边区的国民党代表

● 刘书城

刘定安,曾用名刘奠基、刘定庵。生于1898年,卒于1984年。山西崞县人(今原平县)。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供职于农业部,并且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他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创始人之一,为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存在,为华北抗战,为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195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活动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刘奠基,但是并不相识。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赶忙上前介绍:“这位就是刘奠基。”周恩来顿悟,忙说:“噢,刘奠基先生,知道,知道。”随即向毛泽东主席引见,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知道,并且立即伸出手来与刘奠基热情相握,互致问候。

立志教育救国 投身抗日战场

刘奠基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主与进步的潮流席卷中国,这对他的影响极大。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知道了国家的贫困是科学技术落后,是教育落后造成的。他立志教育救国,1912年他考入山西第一师范学校,后因生活所迫,中途辍学,在乡里和邻县先后作小学教员、小学校长,一直从事教育活动。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刘奠基加入了国民党,并且被选为太原市党部常务委员,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活动。由于他忠实信奉孙中山先生确立的三民主义,越来越看不惯山西国民党右派的所作所为,与右派产生意见分歧,他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北平、南京,一边寻求工作,一面寻求真理。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刘奠基回到太原,在阎锡山、冯玉祥成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政治部”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国开展救亡运动,刘奠基积极在山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山西军阀不断镇压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他邀既是同乡又是国民党元老的续范亭将军辗转南京,亲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哪知国民党代表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只为自己拉选票。续范亭悲愤至极,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唤国人。续范亭自杀未遂,被刘奠基救下,此事件在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震动。刘奠基救下续范亭后照顾左右,直至续范亭基本恢复健康。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续范亭将军应杨虎成将军之邀要去西安,刘奠基决定回太原。两人在临潼分手,赠诗惜别,相约共赴抗日战场。

创建边区政府 ,出任国民党代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续范亭将军回到山西。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议下,阎锡山在太原建立了有共产党、国民党人员参加,包括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界人士共21人组成的“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续范亭将军任主任。9月,刘奠基以“动委会”晋东北特派员的身份赴山西崞县宏道镇一带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抗日武装。他向阎锡山、赵承绶筹集到部分枪枝弹药,交给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武装民众。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共双方都在山西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救国活动。山西民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抗日基础非常好。因此,聂荣臻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并且进一步筹划在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交界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派宋劭文邀请刘奠基赴河北阜平县城,共商建立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事宜,成立了由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王斐然五人组成的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娄凝先、张苏、孙志远九位委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任主任,胡仁奎任副主任。刘奠基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同时兼任边区政府教育处处长。1月3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边区政府的建立,并且明确了边区政府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导,划定了边区范围。边区政府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任命了各县的县长,实行减租减息,配合军队反击日寇侵略,恢复边区经济,支援部队抗战,动员民众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1938年3月,时任中共北方代表的彭真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找到刘奠基,希望他主持恢复和建立边区的国民党组织,出任边区国民党的领导。理由是:国共合作,边区不能只有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必须形成完整的统一战线。刘奠基当时并不愿意挑这个头儿,彭真遂请聂荣臻及刘奠基在中共中的

其他朋友继续做工作。鉴此,刘奠基决定顾全大局,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在边区建立国民党筹备处。实际上,由于日寇占领山西,刘奠基已经与山西国民党失去联系,甚至不知道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和斗争,他已经作为山西国民党中间派人士,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山西省党部委员。因此,中共选择他作为边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既可以体现国共合作,又可以防止国民党中央派人插手边区领导,非常有利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格局,刘奠基历史性地成为最佳的国民党代表人选。

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后,坚持抗日救国,一改旧政府的政风,为民族和人民办事,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戴。共产党的势力壮大,使阎锡山和蒋介石都心存顾虑,1939年开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多次电令阎锡山撤销晋察冀边区。阎锡山出于个人目的,迟迟未下达撤销命令。

捍卫边区地位,功绩青史留名

1939年1月底,刘奠基奉阎锡山命令,受聂荣臻和宋劭文的委托,与胡仁奎共赴陕西宜川二战区司令部汇报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情况。6月,蒋介石得知情况,给阎锡山发电报:“闻刘定庵、胡梅亭(胡仁奎)两兄在尊处,请着来渝一谈。”阎锡山向刘奠基、胡仁奎出示蒋的电报,征询二人意见。刘奠基担心蒋介石旧话重提,当面向下令取消晋察冀边区,不好应对。阎锡山分析,蒋介石不会隔着第二战区,直接向边区政府下令,如果下令,他可以居间审时对应。阎锡山当即决定派车送刘奠基、胡仁奎经陕西赴重庆。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接见了刘奠基和胡仁奎。

到达重庆第二天,蒋介石召见刘奠基、胡仁奎、梁化之三人晋见。刘奠基、胡仁奎转达了阎锡山对蒋介石的问候和致意。蒋介石告之:你们来自前线,对抗战很有经验,请你们来住几天,对抗战工作提一些意见,以便中央参考。第三天,蒋介石再次召见,要求汇报边区政府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边区国民党的情况。胡仁奎汇报了边区政府工作情况,刘奠基汇报了边

区国民党组织筹备恢复的情况，蒋听得非常认真。由于时间关系，蒋介石要求把书面材料留下，并且指示刘奠基向朱家骅详细报告边区国民党组织的情况。

由于刘奠基等来自山西抗日前线，在敌后坚持抗战，受到大后方国民党和重庆社会各界的重视。陈诚请刘奠基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早会上专题介绍边区人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情况。刘奠基讲述了一位边区妇女送子抗战的真实故事。这位妇女的大儿子参加抗日战斗，不幸为国捐躯。安葬大儿子后，她立即领着12岁的小儿子参加八路军。并且嘱咐儿子要多杀鬼子，保卫国家，为哥哥报仇。刘奠基同时介绍了边区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局面。许多学员听后很受鼓舞。但是，也有学员公开指责刘奠基替共产党张目，并且煽动少数人要和刘奠基辩论。胡宗南知道后亲自出面制止。陈诚和朱家骅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主动征求刘奠基对抗战工作的意见。刘奠基提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国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许多国际友人和盟军官员都来晋察冀边区考察，边区对日战斗已经深入到北平和天津等华北大城市外围，对整个华北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中央政府应该继续支持边区的抗战工作，中央政府可以指示华北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边区军民的抗敌斗争，共同扩大抗战成果，为最终收复华北，收复平津做准备。同时，刘奠基请求国民党中央尽快释放张学良，让他组织东北军旧部投入抗日前线，激励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志，增强东北的抗日力量。

在重庆，刘奠基一行积极与社会各界交往，大力宣传介绍晋察冀边区的情况，使更多的人士了解、同情、支持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重庆各派别和各阶层人士也主动与刘奠基和胡仁奎接触，通过他们直接了解敌后抗日斗争的情况。甚至连朝鲜的李承晚、军统的戴笠，以及很多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与刘奠基、胡仁奎交流过抗战意见。

在重庆停留近1个月，刘奠基通过蒋介石的侍从长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于次日请刘奠基和胡仁奎在私宅共进午餐，徐永

昌作陪。午饭非常简朴，餐后刘奠基请委员长对边区工作做指示。蒋介石说：你们回到晋察冀后，请转告同志们，精诚团结，坚持敌后抗战。你们要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多加联系，争取支持。最后，蒋介石送客人到客厅门口，并且看着他们出门后方返回。第二天，蒋介石又派人告诉刘奠基和胡仁奎，要用专机送他们回二战区。当得知刘奠基和胡仁奎要到成都时，蒋介石又安排专机，并电令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妥善接待。刘奠基看到蒋介石没有撤销晋察冀边区的意思，连夜打电报告诉边区政府。据说，接到刘奠基的平安电报后，晋察冀边区军民欣喜万分，特地召开群众大会传达，并且组织了庆祝活动。刘奠基从重庆回到晋察冀边区后，边区政府又组织了群众欢迎大会，迎接刘奠基，庆贺边区政府得以继续存在。

重庆之行，刘奠基利用国民党代表身份坦诚向蒋介石进言，做了大量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他殚精竭虑，捍卫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1943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再次当选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实业处处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以晋察冀边区无党派人士身份与他同赴重庆的胡仁奎，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受党的指派，胡仁奎在重庆期间，利用和朱家骅北大师生的关系，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得到国民党上层信任，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立场，国共两党合作不断出现分裂，两党摩擦不断，刘奠基非常痛心，又非常无奈，他不愿卷入内乱，决定将边区国民党事务交给胡仁奎全权管理。胡仁奎使命所系，正乐得如此。1943年，刘奠基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以示不满。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心系民族，胸怀大义，摒弃私利，一心为国。正是有了这一胸怀和信念，他脱离国民党后，一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继续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从事抗日工作，直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参加了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设，为人民的事业倾心竭力。中国共产党则给予了这位爱国民主人士以应有的荣誉和关爱。

(责任编辑 李晨)

带头实行新老交替的谭启龙

● 杨汝岱

谭启龙同志是井冈山出来的老红军，建国之初就担任省的主要领导职务，先后当过五个省的省委书记。1980年初调到四川，时年67岁。他满头黑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是省委德高望重的老“班长”。

启龙同志到四川不久，即在1980年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要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就必须改革现行干部制度，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解决交接班的问题。启龙同志回来传达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几十年和平时期的积累，形成干部队伍的逐渐老化，“文革”十年破坏更造成青黄不接的局面，解决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非常迫切，刻不容缓，这个重任落到我们老干部的身上。当时四川省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61.1岁，8位书记平均年龄63岁，省委16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8.5岁，3/5的成员超过60岁，成渝两市常委平均57.2岁，省级厅局长平均也有57岁。面对这种情况，启龙同志和省委其他老同志，怀着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干部新老合作交替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1981年，中央印发了陈云同志《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重要文章，在十一届七中全会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讲话。谭启龙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鲁大东同志开会回来后，加快了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从1980年4月到1981年底，全省挑选了2800多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经过省委和中组部领导反复考察和选择，这年下半年开了175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省委常务会通过了增补的候选人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在1982年1月的省委三届六次全委会上进行了选举。在赋予我以省委常务书记重任的同时，杨析综、聂荣贵同志担任了省委常委、副书记，那年我们三人分别为55岁、53岁和49岁。新进入常委的吴希海、伍精华等同志也是50岁左右。

这时，省委着手筹备召开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启龙同志在亲自抓工作报告起草的同时，加紧酝酿换届后班子配备和机构改革的方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合作交替上迈出了很大步子，小平同志从第一线退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在贯彻十二大精神的省委三届七次全会上，启龙同志提出，开创四川工作新局面，要解决思想、行动、班子、作风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搞好交接班，建设开创新局面的班子。他说，正确对待老干部与中青年干部“一退一进”，对我们老同志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考验，退和上都是一场革命。启龙、大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积极主动，6月份就表态要退出领导岗位，当时省里和下面不少同志都希望他们留下来“过渡”几年，他们不同意留任，向中央要求两人先退下来，中央原则上同意退的意见，但要他们暂

留任过渡,培养接班人。十二大以后,省委连续开了十多次书记、常委会议,讨论省级机构改革,着重研究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会上会下仍有不少同志挽留他们。启龙、大东同志向大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向中央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按中央原定的办法,谭、鲁留任过渡;另一个是谭、鲁等8名老书记退出第一线,由杨汝岱、杨析综同志分别担任书记和省长。上报时写明:谭、鲁和多数常委是倾向于后一方案的。

启龙、大东同志仍放心不下,在方案报出后,又在11月4日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再次表明他们的态度,并从四个方面陈述实行第二方案,把步子迈大些的好处:一是主要担子放在中青年干部身上,更能使他们增长才干,锻炼成熟;二是分析了提上来的同志的条件和表现,认为能够胜任,如果过几年才接班,又可能成了过渡性的班子;三是讲年岁不饶人,精力比过去差了,早些交班比较有利;四是四川老干部多,带头退下来更有利于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当顾问后仍可在传帮带方面起作用。报告结尾时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很久,曾多次提出,现再次向中央提出恳求,请中央予以批准。”11月下旬,到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他们又当面向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汇报了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调整方案,以及省顾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协主要负责人建议名单。

那段期间,中央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讨论省、部级班子的调整方案。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研究了好几个省报的方案后,向中央推荐四川的调整方案,认为:“已报来的几个省的方案,唯有四川的方案,使人耳目一新。”12月1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一致赞成并通过我省的方案。12月7日,中央就四川省领导班子调整发出通知(中发〔1982〕52号文件),把四川方案通报给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委,通知中表扬四川省委对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较早,决心下得好,步子迈得大,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轻化方面有重大突破,并以“思想解放、见高识远”来肯定和评价启龙、大东同志的高风亮节。

换届后那两年,彭真、薄一波、宋任穷、万里

同志先后到四川,都高度赞扬启龙、大东同志率先退出省级主要领导岗位,积极帮助支持新上来的同志大胆工作,较好地实现新老合作交替,认为这不仅对推进四川形势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全国带了好头。一波同志还说,小平同志讲新老交替讲了那么久,开始总是推不动。“一退一进”,有人说是进难,退比较容易。事实证明,只要思想解放,放眼全党去选人,进来不算难,实际还是退难。四川打开了这个思路。启龙同志讲得对,担子压在身上,才能培养出来。现在在全国基本上采取了四川的作法,交下去比较自然。由于启龙、大东同志的带头,加快了全国机构改革的步伐。

启龙同志从一线退下来,担任省委常委、顾委会主任后,继续对我们进行传帮带。他多次在省顾委会议上讲,我们是省委的参谋助手,主要是支持,其次是协助,把委托给我们的事处理好。要又顾又问,谦虚谨慎,不干预现在班子的工作,不当指挥员。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上,从不发号施令,从不批条子。发现了什么情况就在早晚散步的时间跟我边走边说,提醒我注意。他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党风。他非常重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为省委谋长治久安之策,在组织编纂出版了全国第一部省情——《四川省情》之后,除了建议我们组织研究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还建议编写出版《蜀乡状元谱》、《天府企业家》,用典型来推动城乡民营经济的发展。1986年离开四川前,他再次分别走访了令他十分牵挂的川北老区和攀枝花、凉山地区,写出了《川陕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仍然很穷》和《开发攀西势在必行》的调研报告,通过省委和中顾委呈报给中央领导同志,为四川贫困山区和民族地区发展而呼吁、献策。启龙同志十分关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在组建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繁荣社会科学、振兴川剧、成立四川省诗书画院、发展旅游产业等方面,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他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绚丽归于平淡”的晚年历史,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是很好的榜样。

(本文节选自《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 任继愈

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

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考试立法严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

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大约尽作蝼蛄死，人言蝼蛄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缢。[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借鉴科举制度，改进当今教育存在的弊病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82年招收的博士生，现在有的成为各学科的骨干。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产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徕的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去培养，势必造成成绩下降。

研究生入学后，本来要求读些必读的书，三年时间内用来专心学习已经够紧张的，现在不是把充实学识放在首位，而是要求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发表论文，还要发表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不照办，即无法毕业。研究生入校后，第一年大部时间用在外语上，博士生还要学第二外语，这要花费较大的精力才能过关。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为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主要精力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为了在刊物上争取发表文章，难免要拉关系，找门路，有的导师用不正当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研究生。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在下滑。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

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现状参差不齐，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授予学位，国家有统一标准，但各校各有自己的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答辩委员中必须有外单位及外校的委员参加。据我所知，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也有学校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不必来校上课，可以派秘书代他上课，当然这类博士生拿到的文凭是真的，博士生学识是名不副实的。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和应试的各有所图，各得其所。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可以培养出合乎国家要求的人才。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学校及不合格的导师将自行消失。

培养研究生不再规定毕业年限，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学完应当达到的学分，可以报国家的科举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国家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备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

十八、十九世纪，列强在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技术人才。智力开发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才智力都是资源，是开发不尽的智力资源。为国家培养合格优秀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从近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学风的邪正，从大处远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国家兴衰。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系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

“裱糊匠”李鸿章

● 向继东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作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鸿章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10月版，3页）梁启超还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李“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我想，大凡读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恐怕都有这种共识。

在晚清权臣中，当属李鸿章最有洞察力。正是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进行竞争，此乃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于是才有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电信、交通、航运、军备等产业，大多始于李氏之手。但是，主流意识几十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欠公允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词”，并非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在慈禧领导下的清帝国是怎样的一副烂摊子，大家都略知一二。当时李鸿章集总理大臣等要职于一身，面对列强的要挟，也绝非以前所说的那样，处处以“卖国求荣”。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9月2日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就最能体现其大国权臣的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

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叫《格利法》的排华法案，剥夺了华裔人在美国的劳动权利，李鸿章很想帮助这些华裔，但又爱莫能助。有记者问他是否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的废除或做较大修改。李鸿

章说：“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你们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帝国的回忆》2001年5月北京三联版，339页）李鸿章对记者，不温不火地说，我听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他们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以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其实，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那么你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还想请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这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一直以自己所拥有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李鸿章说：“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

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欧洲的前面。……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帝国的回忆》340-341页)

李鸿章肯定没有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话语却包含了对这种价值的评估。当记者问到“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时,他的回答是干净利索的:“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让外国投资清国,不怕丧失主权吗?李鸿章说,“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李鸿章吸引外资的宣言,其原则在今天恐怕也没有过时。

当记者问到中国的教育现况时,李鸿章一面承认中国只重男孩教育和穷人家孩子没有上学机会的事实;一面表示将来我们会建立更多的学校,还会建供女孩就读的公立学校,同时肯定欧美的教育制度,表示将学习欧美的适合我们国情的那些先进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谈到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时,李鸿章毫不掩饰对当时的清国报纸的不满。他说“清国亦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

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帝国的回忆》,342页)李鸿章对清国媒体的批评,至今读来,耐人寻味!

当然,这里说“清国报纸”的事,也不排除李鸿章在客人面前作秀,故意说些让客人高兴的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附录了敏章编的《李鸿章年谱》。据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八,李鸿章“以康有为、梁启超遁逃海外,刊布流言,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严密缉拿二人”。次年正月十五,78岁的李鸿章又“诏命南、北洋、闽浙、广东督抚悬赏十万,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令“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也严拿惩办”。这就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李鸿章判如两人了。其实他自己就是“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人,对言论自由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也许,这就是身在中国官场的李鸿章的两面性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李鸿章办了许多错事,亲手签订好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招来骂名。历史地客观地看李鸿章所办的错事,有些的确情有可原,因为一则他是奉命办事;二则清国是弱国,在强敌面前,他李鸿章再想硬也硬不起来。但对李鸿章人品上的缺陷,则没有必要为他辩护。

李鸿章以淮军发迹,很快便跻身督抚高位。他的后半生执掌国家外交洋务大权凡30余年,在为国家办事的同时,也为自己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当时有一副联语流传甚广,道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句说的是翁同龢。翁为江苏常熟人,官居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古时称之为大司农。前句说的便是李鸿章。李系合肥人。李家后人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直系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有大批房产。合同中只提到不动产,至于金银财宝等动产部分还不知有多少。其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为官捞来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则评点文字,题目就叫《李鸿章

贪财》。李鸿章也确实喜欢钱。出访美国时与美国退休将军威尔逊见面就问，“在美国你很富吗？”接着转而又问现任将军卢杰“很富吗”，由此也可见“钱”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据俄国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就陆续从道胜银行获得了沙俄给予的“回扣”300万卢布！至于他从北洋舰队的军需采购中捞了多少，只有等历史研究专家去考证了。

官场宠辱，瞬息即变。李鸿章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1896年冬，李鸿章出访回京第二天，兴冲冲“觐见光绪，呈递国书宝星”。四天后，却“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交部议”。后被“吏议革职，旨改为罚俸一年”。次年，也许是李鸿章最灰心丧气的一年。敏章编《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李鸿章传》，174页）接着，李鸿章又反躬自问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就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同上，174-175页）……

当时清国如此衰败的症结何在？1895年2月北洋水

师战败，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伊东中将一针见血，指出清国之所以落败的原因就是开科取士。不知当时的李鸿章是否看到过这封劝降书，但在两年后失宠的李鸿章就说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李鸿章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李鸿章传》175页）

李鸿章毕竟是个历史人物，其身影且行且远。今天重温这个历史人物，能从其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启示，才是最重要的。李鸿章说自己是个“裱糊匠”，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甘当“裱糊匠”，才使中国的事情越办越糟，终于一败涂地，自己也被定格在那个揪心的历史场景中。

（责任编辑 萧 徐）

国内刊号: CN23-0018 邮发代号: 13-18
 全年价96元, 月价8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破季破月订阅
 《老年日报》社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电话: 451-84649511 传真: 0451-84649511
 老人热线: 0451-84692331

不寂寞的晚年 从《老年日报》开始

科学报必不可少 记忆力增量为关键
 什么方式最健康 专家开出良处方

http://www.lnrj.net

《清明上河图》之谜

● 张梦君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

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行李。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

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

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铃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铃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张择端的身世之谜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

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

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清明”与“上河”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碾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地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对扇子的考证叫人折服。《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这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拂暑驱蝇，但是在北宋这个时期还另有它用。

扇子除有题诗作画、扑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这一风俗由来已久。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对方心神领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由此看来“便面”习俗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

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

《清明上河图》——

你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想占有你。

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懂你?

(张梦君,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中央电视台即将播出的八集历史文化纪录片《清明上河图》导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为本刊明年调价致读者

《炎黄春秋》自1991年7月创刊,至今已度过了15个春秋。十五年来,我们在编辑工作上,团结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包括很多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和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为刊物提供很多高水平的文章,使读者能开卷受益;在经济上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节俭办刊,尽力减少读者的经济负担,确定较低的定价。

近些年来随着出版成本的增加,杂志社的经济状况出现了困难,不少熟悉本刊情况的热心读者来信,有的亲来杂志社,建议提价。他们的心和编者相通。社委会经多次研究,都决定通过内部节约挖潜,弥补亏损,不提价。从1998年至今已7年了,每期每册定价一直是

4.8元。

但节约的潜力是有底限的,去年以来,亏损有所增加。于是提价成了不能回避的选择,社委会经反复研究、比较,决定自2006年1月起,每期每册提价一元,这个价位仍低于相同页码、相同印制质量刊物的定价。相信这个涨幅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很多读者曾表示,他们关心的是能在刊物上读到更多的好文章,而不是每期涨了1元钱。在杂志社方面,提价增加了收入,加以进一步的节约措施,就可以维持刊物正常出版。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支持。

《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

矢野浩二： 我想演一个中国人

● 章 弘

今年,是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六十个年头。打开电视,抗战的故事令人目不暇接。细心的电视观众都会发现,在一系列抗日电视剧名作中,有一个目光像豺狼一样凶狠,声音像魔鬼一样沙哑,面部经常令人恐怖地抽搐的日本鬼子格外引人注目。而这个令人难以忘记的鬼子形象竟是由一位日籍演员扮演的,他的名字叫矢野浩二。《烈火金刚》中的“毛利太君”,《小兵张嘎》中的“斋腾队长”,《记忆的证明》中的“冈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多田”等等,就都是他扮演的。那么,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扮演一个日本鬼子呢?

身 世

当矢野浩二先生走进他所隶属的演艺公司那间洋溢着绿色的客厅时,他伸出双手与我们一一握手,双腿紧合腰身向前。那双像豺狼一样凶恶的眼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笑容。完全难以想象,那么多善良的中国百姓就是“他”杀的。

矢野浩二先生出生在大阪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四个孩子中他不仅最小,而且还是唯一的男生。小的时候备受全家人的宠爱,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放弃我了”。高中毕业以后,由于日本至今没有一所专门教授表演的大学,矢野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到了一家只有他和老板两个人的小酒馆当起了酒保。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了,一位回头客劈头盖脸地对矢野说道:窝在这儿干嘛,想演戏就到东京去!矢野浑身上下就像注射了吗啡一样,他一下子亢奋起来,辞掉了工作,离开了故乡大阪,加盟了东京的太阳音乐公司。

几年过去了,矢野虽然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演艺之

路,但是他出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犯罪嫌疑人甲,警官乙,有时只有一句台词,有时只有一个背影。直到2000年,矢野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

来 华

2000年,矢野得到了一次来中国拍戏的机会,他在一部叫作《永恒恋人》的青春偶像剧中扮演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角色。那时的矢野一句中文也听不懂,对于中国的了解仅仅是看过《西游记》的动画片。

然而《永恒恋人》剧组的创作氛围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不仅仅是导演拍戏时的细致,更是全剧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国人非常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工作上的同事可以发展成为朋友,朋友关系也可以发展成为工作伙伴。而在日本,工作就是工作,朋友就是朋友,分得太清楚了。”《永恒恋人》剧组的创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为不懂中文的矢野讲述剧本,在野外拍戏时,也尽量安排他到卫生条件好一些的饭店食宿。这一切都让这位初踏上中国土地的年轻日本人有了贵宾加亲人的感觉,矢野做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大选择——到中国来!

“鬼子”

2001年5月,矢野为了演艺事业再次来到中国。他先是进入了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然后又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深造表演。这一次,他是准备长期扎下来了。

很快,矢野的片约接踵而来。《走向共和》中他扮演了“明治天皇”;《记忆的证明》中,他在一部戏中同时扮演了“冈田”和“青山洋平”两个角色。由于人物跨度很大,历经几个历史时期,这也是矢野付出努力最多收获最大的一部戏。

接着,一部部燃烧着中国人民抗日烽火的剧本放到了矢野的面前。《小兵张嘎》、《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无一不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名作,无一不是让矢野扮演一个杀戮我黎民百姓的日军军官。

矢野浩二先生与大多数日本的年轻人一样,对于那一段充满血和泪的悲怆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看到剧本中的故事,他首先感到的是震惊,“日本人真的这样干过吗?”他开始广泛地学习那段历史的知识,让自己的观念尽快客观起来,以便学会尊重历史。每次拿到中文脚本以后,他首先要反复阅读,然后再一字一句地翻译成日文,为的是自己更好地理解剧情,把握人物的心理状态。“那都是历史,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作为一名演员,我必须演好我的角色。”

尽管矢野在心理上认同脚本对故事和人物的描述,但是他毕竟生长在战后的大阪,“最难的就是表现旧日本军人的眼神和形体动作”。于是,他调来大量的中国抗日战争黑白电影故事片,观摩“松井”、“山田”等中国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形象。他还观摩了大量中日两国的黑白纪录片,从中寻找日本侵略者的动作和表情。导演和矢野都发现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的强烈义愤,早年中国抗日战争电影故事片中的日本军人都是打打杀杀,虽然凶恶但不免有些脸谱化。于是,在中国导演的指导下,矢野创作的日本鬼子会笑了,甚至还拍中国人的肩膀,还请八路军吃饭!他让日本鬼子不仅残暴,而且更加伪善和奸诈了。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扮演着凶恶的日本鬼子,让广大中国人民更加仇视日本鬼子,为什么?矢野为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在采访了矢野以后,一定要约矢野共进晚餐。走进餐厅时,那位记者年过七旬的祖父祖母也在。当矢野得知两位老人都是抗日战争亲历者的时候,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他以为他会遭到声讨和谴责。然而,两位中国老人却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问寒问暖,加水夹菜,让矢野再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和中国人的宽容。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扮演的角色就恨我,他们恨的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军人。我也不希望中国人民看了我的表演就会仇恨今天的日本人民。但是,通过我的表演,人们都能够看清历史,今天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和尊重,

那不是好事吗?我是一个演员,我要演好我的角色。”

面 对

矢野浩二先生在中国的演艺活动,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反响,在日本也引起了轰动。《记忆的证明》在日本部分电视台播出以后,日本一家非常大的亲右报纸点名批评了矢野先生“住在中国就偏向中国”。矢野先生的个人网站也同样遭到右翼人士的攻击,责问矢野究竟是哪国人?

面对来自日本国内的杂音,矢野先生反倒失去了和蔼和亲切,第一次表现得激动起来。“虽然批评我的人很少,可以忽略他们。但是我还是想问,怎么啦,有什么意见吗?我是一个演员,我在演我的戏,在塑造我的角色,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决不像他们所说的住在中国就偏向中国,就是因为我是客观的,中立的,所以才会演出那样的角色!而且,日中两国干嘛要对立呢?”

但是,矢野先生还是有些担心,他甚至想到了走出东京成田机场时要不要买个帽子,遮住自己的脸,甚至在问这样演下去自己会不会“真的回不了国”?就在这种时刻,那些曾经“几乎放弃了”矢野的家人们给了矢野极大的鼓励,他们支持矢野在中国继续演下去,并为矢野在中国的成功感到骄傲和自豪!

《烈火金刚》在全国各个卫视台播出以后,无论矢野走到哪里,认出他的人都会叫他“毛驴太君”。矢野也希望不光让他演日本鬼子,他也希望在反映和平生活的剧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无论走到哪儿,去餐厅吃饭也好,坐在车里也好,我都会仔细观察中国人的表情和动作。我太喜欢中国人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演一个中国人!”

笔者曾经听到长辈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的惨烈岁月里,一大批日本的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和平的感召下加入了八路军,他们很多人一直在我军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有一次,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身负重伤,日籍的八路军军医们立刻搭起帐篷开始抢救。日军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八路军的阵地,四位日籍八路军军医岿然不动地为那位八路军指挥官做完了手术。当那位八路军指挥官苏醒过来以后,紧紧地握着日籍军医们的手说:“你们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

(责任编辑 萧 徐)

欢迎订阅2006年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溢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定价：每期5.80元，全年69.60元。(本刊调价启事见内文78页)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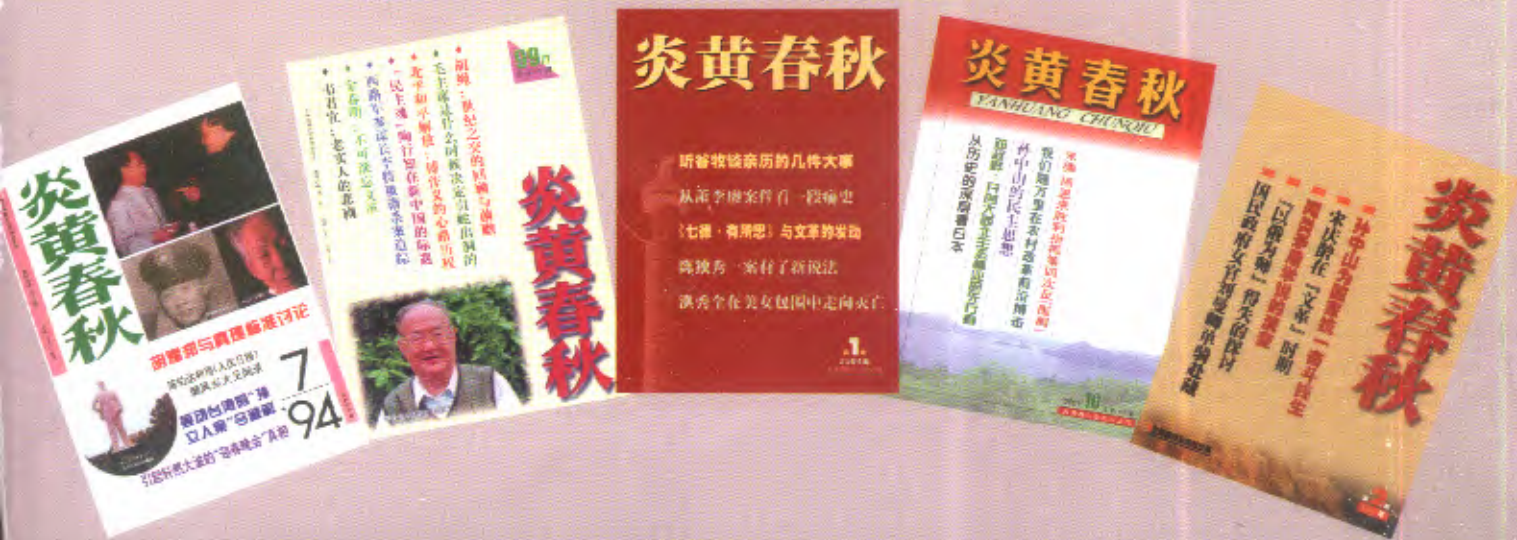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5年第**11**期

重读顾准 —— 纪念顾准九十诞辰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

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裱糊匠”李鸿章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